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20 年
1-3 月

- ▶ 我院连续 5 年赴美国 ASSA 年会招贤纳士
- ▶ 我院多措并举保障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两不误
- ▶ 我院冯帅章教授的合作论文被国际权威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接受发表
- ▶ 我院副教授谷一桢的两篇合作论文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及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接受发表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1 月, 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合实施的“111 计划”。同时, 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担任海外中心主任, 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 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 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 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 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我院连续 5 年赴美国 ASSA 年会招贤纳士	02
我院召开线上会议部署疫情防控期春季开学各项工作	04
战“疫”教学两手抓, 我院多措并举保障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两不误	04
02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	09
科研成果	10
03 学术活动	
SEMINAR	12
04 思想聚焦	
经济战疫专题	15
外国人居留条例解读	29
好文回顾	40
05 数据调查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54
06 人物专访	
IESR 人物	57
07 学生天地	
抗疫, IESR 师生在行动	65
08 图说	
【女神节特辑】IESR 女教职工在抗疫期间的小美好	72

学院要闻

我院连续5年赴美国ASSA年会招贤纳士

我院召开线上会议部署疫情防控期春季开学各项工作

战“疫”教学两手抓，我院多措并举保障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两不误

我院连续5年赴美国ASSA年会招贤纳士



Klaus Zimmermann 教授(左)、James Heckman教授(中)与冯帅章教授(右)

2020年1月3日至5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冯帅章院长率队赴美国圣迭戈参加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 (ASSA Annual Meeting 2020) 开展年度海外招聘工作。这是我院自2015年成立以来，连续五年通过美国高端人才市场招贤纳士，为我院提升师资国际化水平、持续推进高水平人才引进战略提供重要保障。

此次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海外招聘工作面向应用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产业组织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各领域的应聘者展开。我院多位特聘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胡颖尧、杜克大学经济系教授徐熠与研究院教师组成了专门招聘小组，对近百名应聘者进行面试。应聘者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著名高校，专业上涵盖了劳动、卫生与教育、环境、城市、区域、房地产、宏观、公司金融、计量、产业组织、贸易等经济学各领域。

会议期间，IESR在会议主会场隆重召开招待会。2000年诺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主编 Klaus Zimmermann 教授出席，并在招待会上向获奖者颁发了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杂志 Kuznets 奖。



招待会现场

招待会由 IESR 副教授史炜主持。会上，IESR 院长冯帅章首先向参会的来宾简要介绍了学院情况。冯帅章提到，IESR 在短短的 4 年中已经迅速发展，目前已拥有 42 名全职教师，在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的同时，开展了丰富的学术与政策交流活动。同时，通过建立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IESR 开展了多个大型调查项目，并利用不断完善的数据平台持续为研究者提供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冯帅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经济学者加入 IESR 大家庭，一起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冯帅章教授介绍 IESR

随后，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主编 Klaus Zimmermann 教授在招待会上宣布了该杂志的年度奖项 Kuznets 奖。在发言中，Zimmermann 教授首先感谢了 IESR 对此次招待会的精心安排。作为杂志主编，他也对冯帅章等几位共同主编的工作表示了赞赏与肯定。本年度 Kuznets 奖授予 Gautam Hazarika、Chandan Kumar 和 Sudipta Sarangi 三位学者的合作论文 "Ancestral ecological endowments and missing women"。James Heckman 教授为获奖者颁发了这一荣誉。



James Heckman 教授为获奖者颁奖

James Heckman 教授在随后的致辞中谈到了自己和 IESR 的长期合作。他谈到自己和 IESR 学者合作展开了许多重要而有趣的研究。在过去几年的访问与交流中，他也深深感受到 IESR 在短短几年里的飞速发展，并对 IESR 的未来寄予厚望。



James Heckman 教授致词

我院召开线上会议部署疫情防控期 春季开学各项工作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工作要求以及暨南大学关于疫情防控期春季开学相关工作的安排和部署，我院特成立疫情防控及春季开学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冯帅章教授担任组长。2月17日至18日，冯帅章院长通过召开线上会议部署我院疫情防控期春季开学各项工作，保障开学后我院高效有序地开展教学、科研、智库、行政等方面的工作。

会上，我院各部门根据暨南大学相关要求，重点汇报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各项工作安排和重点举措。一是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排查摸底全覆盖。成立疫情防控及春季开学工作领导小组，落实相关责任人，认真做好我院师生的每日健康状况和行踪去向数据统计，并及时向领导小组和学校汇报。在此基础上，做好对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师生分类防控工作，落实疫情源头管控。二是停课不停学，利用线上系统开展教学工作。根据我院

学生工作方案，抓好组织实施，加强教师线上授课培训，根据课程特点做好教学设计和备课工作，确保教学质量。同时，合理安排毕业生论文撰写、答辩等相关工作。三是依托线上会议系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及政策研究，稳步推进政策研究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日常工作，有序开展国家级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四是做好宣传引导，依托媒体平台传播正能量。充分利用我院公众号、网站、微博等宣传渠道，加强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和引导，不造谣不传谣，坚定广大师生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五是发挥行政部门的后备力量，做好日常管理协助工作，保障我院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我院全体师生将进一步统一思想，密切协作，落实相关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同时，聚焦新学期教学工作、科研工作、智库建设、调查项目等重点，强化统筹、精准发力，确保实现我院新一年工作的良好开端。

战“疫”教学两手抓，我院多措并举保障疫情防控和教学工作两不误

3月2日，我院学子们正式开始线上课程，听不到熟悉的上课铃响起，但大家以另一种方式相聚。同学们第一次在家里“上大学”，老师们也走下昔日的讲台第一次在屏幕面前“传道授业”，成为在另一条战线上抗击疫情的人。

在举国上下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我院全体教职工统一思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贯彻落实暨南大学关于疫情防控期春季开学相关工作的安排和部署，同心同力，各司其职，共同守护师生们的“家”。

同时，在疫情防控面前，我院教师始终秉持高度的教学育人责任感，调整工作状态，创新思路，苦干实干，以积极的态度攻克新形势下的教学挑战，扎实推进新学期我院的各项工作目标，保障教学科研工作有序、稳步向前。

排兵布阵 筑牢校园防控堡垒

自疫情防控的战“疫”打响以来，我院高度重视，周密安排，设立多道疫情防控“防火墙”，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 成立以院长冯帅章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及春季开学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我院实际情况制定工作预案。

• 自2月7日起开始开展全覆盖的师生疫情防控摸排工作，详细掌握我院每位师生的行踪及健康情况。

• 分批有序返岗，避免人群聚集引发交叉感染。对于返校返岗职工，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并对其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及时监测。

• 做好办公场所及公共区域的通风和消毒工作，为返校工作的教职工营造一个安全的办公环境。



返岗职工在岗期间自觉做好个人防护

在防“疫”战场上，我院学子们也勇担时代重任，心系国家社会，积极投身到当地疫情防控各项志愿服务工作中，担当起社区体温测试员等角色。更有学子慷慨解囊，捐赠口罩等防护物资支援抗疫，共同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全员备战“云端”课堂 教学质量不打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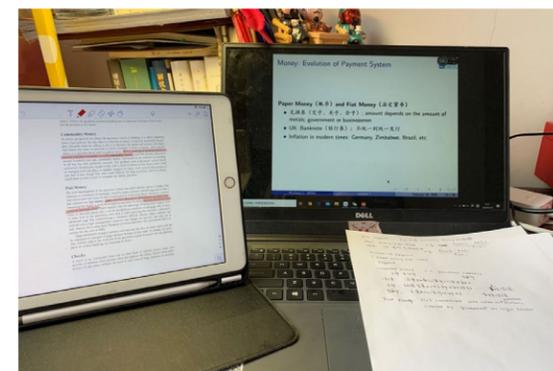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我校延迟了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返校时间，但在“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总体思想指导下，确立了“延学不延教”的工作思路。为确保在线授课能够如期顺利开展，我院成立领导小组，及时制定相关文件筹划新学期教学安排，按计划、分阶段积极推进线上教学工作，努力做到“工作有预案”“教学有备案”。

面对新潮的云教学设备，老师们难免稍显手足无措。针对此类问题，自2月15日起，我院组织任课老师参与线上教学系统培训，创建任课老师微信群，并安排相关人员开展线上指导和培训工作，帮助任课老师尽快熟悉平台相关功能和操作，提高互联网教学能力。



任课老师微信群讨论热烈

在挑战面前，我院任课老师毫不松懈，“撸起袖子加油干”，认真制定课程教学方案，优化线上教学设计，提前录制好前四周的教学资源并上传到相关平台中去，及时完成备课工作。为保障线上课程能够保质保量地如期开设，在线上教学试运行期间，我院成立教学督导组安排相关老师对每堂课进行听课，及时了解教学质量与网络秩序，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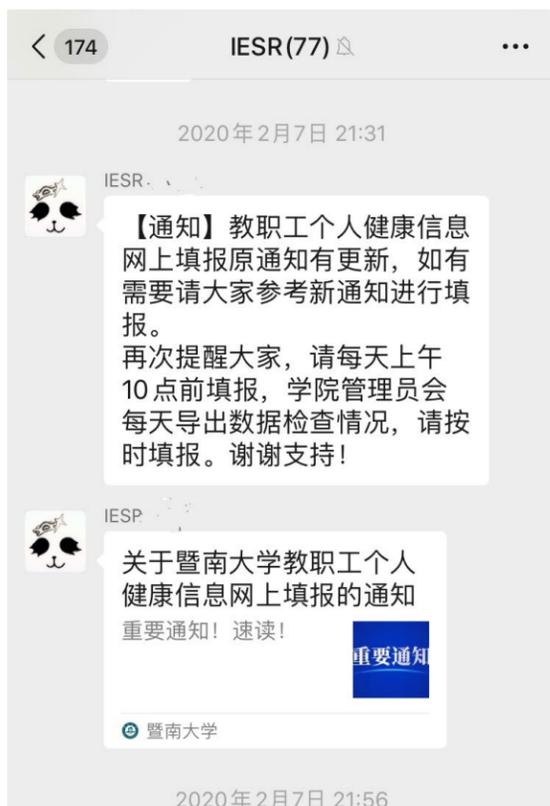
我院老师及学生对课程进行试听

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我院正有规划且如期进行学生注册、选课及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等相关学生工作。为保障毕业班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我院结合学院实情制定相关文件，对毕业班毕业论文、毕业答辩等工作做出了详细的时间规划及工作安排。

师生相约“云课堂”成功打卡新学期第一课

3月3日，我院迎来线上教学的第一天。线上教学运转总体平稳有序，老师们教学态度认真，学生学习热情高涨，到课率高。

课上，老师们“各显神通”，熟练掌握设备操作，通过雨课堂、腾讯会议、zoom等平台灵活授课，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合，为学生呈现了一堂精彩纷呈的“云课堂”。期间，老师们通过利用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有效克服了线上授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确保了线上教学的质量。



我院认真做好相关防疫防控工作

我院疫情防控工作能够有序开展，离不开返岗职工的一份努力。他们把初心写在行动中，把使命落在岗位上，担当起校园疫情防控的校园卫士和逆行者的角色。返岗期间，他们积极做好个人防护，自觉进行体温检测，佩戴口罩上岗，切实做好防疫防控的同时，做好各项后勤服务工作，保障我院各项工作能够有序推进。

线上教学质量调查



亲爱的同学：

受疫情影响，本学期先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开始课程。为提高教学质量，本周上完课后，请大家花几分钟填写问卷。感谢您的支持~~

“不落下每一位学生”是每位 IESR 老师对自己的要求。任课老师们除了线上教学时展开相关讨论、提问环节外，还针对每门课程建立相对应的微信群聊，与学生进行线上讨论，及时解答学生的困惑并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另外，我院还为学生安排了相应的助教以便于线上答疑。

针对老师与学生展开 线上教学质量调查

为能及时地查缺补漏，更好地保证线上教学质量，我院针对学生和任课老师两个群体分别展开《线上教学质量调查》和《线上授课问卷调查》。据数据显示，对于线上授课学生整体满意度高，同时，更有学生针对平台功能使用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为未来线上授课质量往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求学的路上，距离从不是困难，更不会受疫情所阻挡。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相约“云课堂”，畅游知识的海洋，并期待着，在未来相见时，那句久违的“同学们好”！

线上授课问卷调查

请各位老师及时填报

亲爱的老师，您辛苦了！为保证线上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请上完课后填写问卷，感谢您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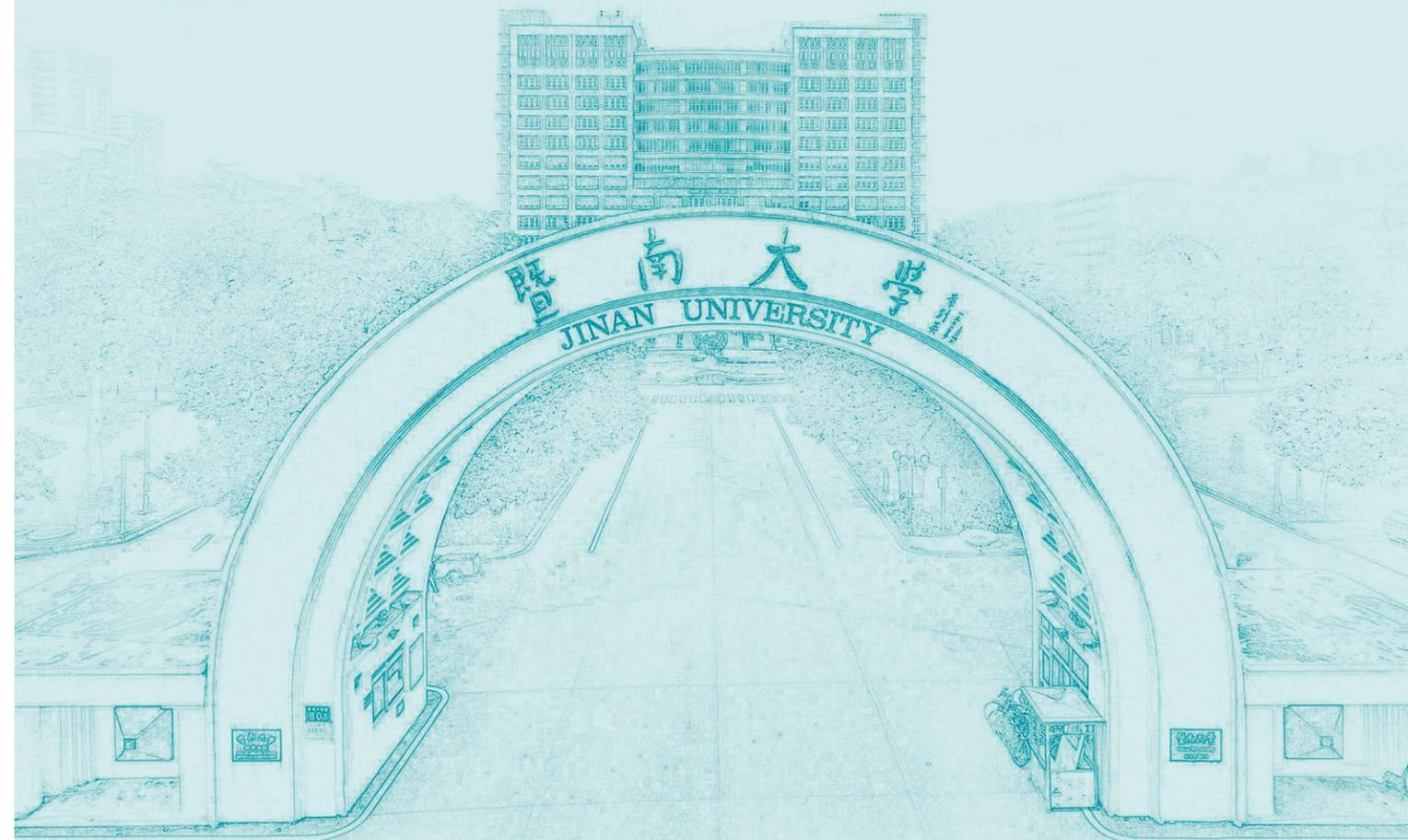
课程名称 *

学生年级 *
请选择

1. 本次课堂是否顺利：
顺利/不顺利（请填写原因：网络卡、平台不适合教学、学生互动不高等）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



论文发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的合作论文“Sensitivity of Self-Reporte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Survey Administration Conditions”（合作者：Yuanyuan Chen, James J. Heckman, Tim Kautz）被国际权威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接受发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我院副教授谷一桢的两篇合作论文被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及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接受发表。

即将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上的文章题为“Connecting the Countryside via E-Commerce: Evidence from China”，合作者为 Victor Couture, Benjamin Faber, Lizhi Liu。

另一篇将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的文章题为“Subways and Road Congestion”，合作者为 Chang Jiang, Junfu Zhang, Ben Zou。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我院助理教授王武毅的合作论文“Identifying Latent Group Structures in Nonlinear Panels”（合作者：Liangjun Su）被计量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接受发表。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我院助理教授陈思宇的合作论文“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Crimin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the NOx Budget Trading Program”（合作者：Teng Li）被城市经济学重要期刊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接受发表。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我院助理教授朱宏佳的合作论文“Can price regulation increase land-use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land market”（合作者：Yatang Lin, Qin Yu, Yang Yang）被城市经济学重要期刊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接受发表。

科研项目

我院副教授谷一桢的课题“电子商务和农村家庭福利：基于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计划的实证研究”获 2020 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立项。



个人介绍：

谷一桢，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于 2015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为城市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已有多篇研究成果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等国际权威期刊。

学术活动

SEMINAR

SEMINAR

我院首次线上 Seminar 开讲： 跨越空间阻隔 共享学术之美



网络图片

2020年3月27日，我院迎来了本学期第一场线上学术 Seminar。本次 Seminar 的主讲嘉宾为南京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朱明英博士，题目为“The Human Impacts of Air Pollution: Three Studies Using Internet Metrics”。此次线上 Seminar 由我院助理教授陈思宇主持，近 60 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及 IESR 师生通过线上视频网络平台参加了此次线上 Seminar。

主讲人朱明英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健康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重点关注中国、印度及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问题。她擅长运用大数据处理方法对市

民的互联网行为进行分析，进而探究空气污染的短期暴露与失眠、呼吸道疾病及精神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因果效应。

在本次 Seminar 中，朱明英博士介绍了她在三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其一，她利用微博数据，基于语义分析的结果，估计了空气污染对失眠的影响。其二，她利用百度指数所揭示的信息，估计了空气污染对疾病发病率的影响。这两项研究都从新颖的视角出发，对我国空气污染所造成的健康成本进行了度量。此外，朱明英博士还介绍了她关于空气污染如何影响城市间移居意愿的研究。在整个 Seminar 中，多位参会者通过语音提问与主讲人展开互动，讨论气氛热烈。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有条不紊地开展的同时，我院的学术交流工作亦步履不停，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为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搭建学术分享与交流的桥梁。

我院教师表示，以 Seminar 系列为代表的众多交流活动一直是 IESR 学术氛围与影响力建设工作中的一个亮点，而线上 Seminar 使得疫情期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目前的技术支持可以很好地实现主讲人与参与者之间的即时互动，保证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与质量。线上活动的方式也打破了空间上的限制，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跨地区间学术交流往来的成本。对比传统的线下讲座，我院本场 Seminar 向学者们展现了线上学术 Seminar 的便捷性和包容性，得到了校内外参会专家学者的赞赏与认可。

此外，一直以来，我院都会为到访的 Seminar 主讲人安排与学院教师一对一交流的 office hour，为双方提

供深入交流的机会。本次线上 Seminar 活动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 Seminar 结束后，我院多位教师通过线上 office hour 的交流形式与主讲人进行了一对一的沟通。我院助理教授陈思宇表示：“office hour 的交流效果非常不错，我与主讲人充分进行了沟通。在疫情特殊时期，线上讲座和 office hours 的交流帮助我们克服地理与时间的限制，跟进学术进展。我认为，疫情结束之后也可以继续推进线上活动，灵活地达到全球信息共享。”

自成立以来，我院扎根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展开具有国际化高标准的学术研究，并不断搭建和完善学术交流平台，汇聚国内外经济学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学术之美，共商学术发展之计。本次线上学术 Seminar 的成功召开，是我院学术交流会从传统的现场交流向“互联网+”转化的一次新的尝试，我院在开展线上 Seminar 方面所做的探索也会为未来以多种形式开展学术活动提供更多的可能。

我院线上召开本学期首期 Brownbag Seminar

3月4日，我院全体教师通过视频线上参与了本学期第一期内部 Brownbag Seminar，开启了一场别样的学术交流会。在本次内部研讨会中，我院副教授史炜介绍了与助理教授邱筠合作开展的最新研究。该研究以“Impa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in China”为题，紧跟当前形势，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新冠病毒传播的影响。研讨会持续1个小时，我院40余位教师加入直播间，全程认真参与其中，积极通过语音对话等方式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会上学术氛围十分浓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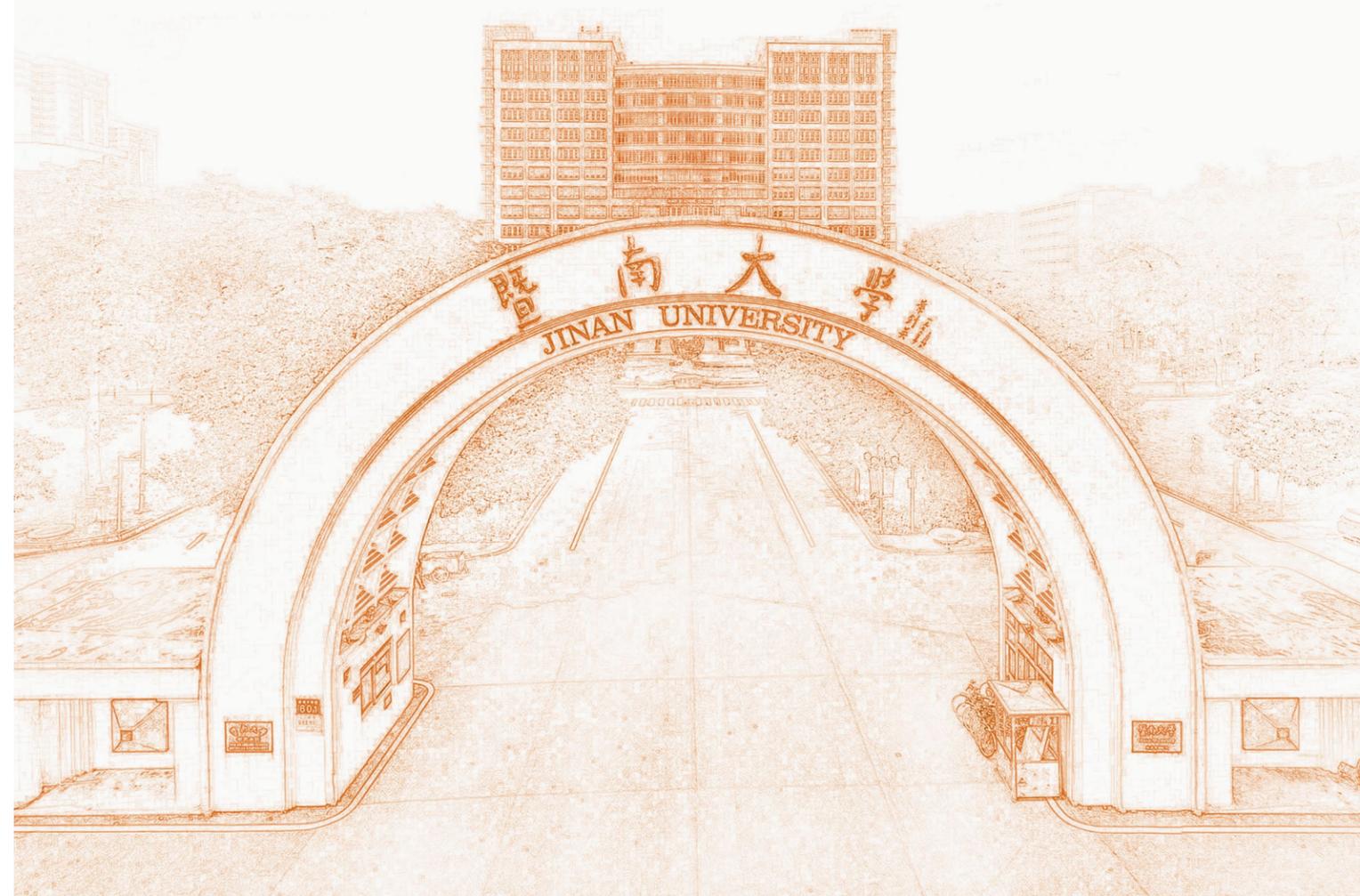
自我院成立以来，Brownbag Seminar 一直是我院学术科研工作的特色活动，是我院为加强知识管理和内部交流有效融合而搭建的一道桥梁。这场疫情虽然让教师们“足不出户”，但却不能阻隔他们之间的交流合作，同时更不能阻挡他们追求学术的脚步！

思想 聚焦

经济战疫专题

外国人居留条例解读

好文回顾



经济战疫专题

【澎湃】张思思 谢慧如：疫后楼市出现明显分化

作者：张思思（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谢慧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房地产（网络图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自2019年12月于武汉爆发以来，目前已蔓延至全国31个省市及港澳台和世界24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前疫情的防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对我国经济短期造成较大冲击，特别是对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娱乐等行业冲击严重，房地产业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销售减少，影响房企资金回笼

暂停售楼处销售活动、企业复工时间延后等举措，直接影响新房销售及房地产企业短期资金回笼和开发投资。销售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销售放缓将显著影响房企短期资金面，房地产开发商可能

放慢拿地、开工等节奏。此外，建筑施工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目前疫情导致全国范围内短期开工不足。因此，疫情会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和上下游产业带来不利影响，预计将突出反映在今年一、二季度房地产在建、新开工、投资等指标上。

全国范围看，如果疫情能在第一季度得到较好的控制，只会对年内商品房竣工面积数量造成一定影响，但对市场的总体供给影响不大，而各地的房价和成交量数据将进一步分化。三四线城市的影响会高于一线城市，因为在返乡置业潮影响下，春节期间的房地产市场交易通常集中在三四线城市，预计加大三四线城市下半年商品房的去库存压力。疫情严重的湖北省所受影响最大，预计2020年住房销售面积及房价均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冲击住房租赁市场和商业地产

疫情影响下，务工人员返岗时间延后、人员限制流动，这将对人口流入大省的住房租赁市场和商业地产造成一定损失。以广东省为例，百度迁徙大数据显示，广东省总迁徙量在全国占比22.9%。然而，广东省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迁徙规模明显下降，预测还有大批人员未回流。流动人口以租房为主，返城时间延后对租赁市场有一定影响，但我们预期住房租赁市场的直接损失有限，主要因租赁合同签约时间较长，且租赁住房一般为刚需。需要注意的是，对零售业和餐饮业等服务行业的商业地产影响更大。对服务行业而言，春节期间是传统的旺季，疫情影响下客流大幅度下降、商场关闭、营业收入骤减，商服类地产受到不小的冲击。

收入下降，购房需求延后

除此，疫情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比较明显的短期冲击，导致大量交通、服务、旅游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收入下降，一定程度上减少或延后购房等大额消费需求。疫情冲击下，人们的出行、旅游、消费大量减少。服务业、旅游业和物流业等行业首当其冲，另外由于物流不畅通，网购、外卖等新兴零售业也不免受到影响。企业停工停产等措施，导致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产能恢复延后。根据中指研究院3000份的线上调查，70%的调查者表示推迟购房。

回顾2003年SARS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虽然2003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下滑两个百分点到9.1%，但在2003年6月份疫情稳定之后，宏观经济增速在第三季度回升至10%，全年GDP增长为10%，疫情不改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此次新疫情正处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与2003年的上升期不尽相同，但房地产市场较17年前更加成熟完善，对抗风险能力更强。对外来人口流入大省，人口依然支撑房地产的中长期需求。对疫情严重、人口流出的一些地市，房价支撑因素弱，可能会看到价量同时萎缩。

如何应对？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需要引起重视，对此我们建议政府与业主合力推行减租免租行动，暂缓企业公积金缴存，保障租户权益；防范中小房企及长租公寓平台的金融风险；在未来加快房地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满足市民对绿色健康住宅的需求。

倡议扩大免租减租覆盖范围，允许困难企业暂缓缴纳公积金

疫情爆发至今，我们看到政府、金融机构、房企和地产行业协会迅速行动起来。国有物业带头免租，各大房企为疫区捐资捐款及对商户和住客免租减租，行业协会倡议广大业主免租行动，这些行为值得赞赏。但目前租金优惠的覆盖范围还不够大，例如某长租公寓平台内部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四座城市，愿意减免房租的房东只占12%。

租金对企业或工商个体户，是较大的固定支出。主动给企业减税降费，我们对此建议一是私人业主由政府、业主、租户各承担三分之一租金，实行“三三制”。对于长租公寓，鼓励长租公寓平台尽快积极联系业主，可由政府、业主、长租公寓平台、租户各承担四分之一。加强对长租公寓平台的监管，谨防和严惩租赁平台欺诈租客和房东，“两边通吃”的行为。二是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申请暂缓缴存住房公积金4-6个月，待企业效益好转后再恢复缴存。

“租购同权”保障租客权益

需要重视租客权益的保障工作。北京、杭州、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出现以防范疫情为由，对无论是否来自疫区，身体是否健康的租客一律禁止进入、劝返的事件。租购同权“同”的不仅是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更应该保障不能肆意侵犯的法定基本权利。应把维护租户的基本权益作为租购同权的重要内容，避免出现对租户的歧视。

落实还贷延后具体措施， 关注新市民和农民工群体

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政府应协调各银行尽快出台并落实相关的具体措施，比如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经接入机构认定，相关逾期贷款不作逾期记录。金融机构对个人信用记录良好的相关客户，适当延长贷款还款期限，给予一定利息优惠。除以上在《通知》中明确提到的群体外，还应特别关注新市民及农民工群体。复工时间延后，这类群体的收入影响较大，加上积蓄较少，还贷更加困难，建议政策向此类群体倾斜。

注意中小房企和长租公寓的流动性风险

房地产相关的金融产品多数集中在一级市场，以个人住房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为主。目前房企销售放缓，短期资金紧张，政府需要注意房地产企业流动性状况，特别是中小房企和长租公寓平台的信用风险。共克时艰，银行体系应保持充足流动性，防范房地产相关信用风险。我们预计，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房企破产重组、项目收并购可能显著增加，进一步加剧行业分化和向龙头企业集中。

我们建议房企和相关中介，房地产行业协会积极发挥自治作用，监测相关房企的负债状况；金融体系，对过往信用记录良好，资金周转困难的房企的贷款进行展期；对给予疫情期间租金减免的物业或房企给予一定财政补贴或税费减免。

未来引导房地产业转型升级， 主动适应市民新需求

疫情推动房地产行业朝智能化、线上化发展，并催生新的业态。由于售楼处关闭，房企转向线上售房，疫情之后这种新型看房购房模式将更加流行，也能帮助房企节约成本。谋求数字化转型的房企可加大线上销售渠道的推广力度，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寻求精准营销投放。比如开发VR看房功能，建立销售社群等。

疫情危机也提升了居民对居住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需求及绿色健康住宅的需求。人们对小区健康标准重视程度空前上升，对城市安全、居住环境、配套生活保障设施的需求将更高，例如非接触式水龙头、声控开关、感应设备、住宅内健身房、大卧室等需求增加。通风好、人口密度低、环境通透的“健康住宅”可能成为新的卖点。顺应需求，房企将向此靠拢，筑建更加安全健康的住宅及社区环境。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以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月18日文章

南方日报访张思思：疫情推动 房地产行业发展新路径



房地产（网络图片）

近日，南方日报连续采访我院副院长、副教授张思思，谈疫情危机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2月19日，南方+发表文章《物业战役 | 万科物业提前启动2万人招聘计划》，张思思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疫情防控对我国经济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比较明显的短期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影响并不会很大。疫情将推动房地产行业朝智能化、线上化发展，并催生新的业态。疫情危机也在提升居民对居住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需求及绿色健康住宅的需求，由此为行业带来新的机遇。

面对这次疫情带来的产业新机遇，张思思则表示，政府可通过税收等政策鼓励房地产企业主动适应市民新需求，建立更加安全健康的住宅及社区环境，一个平稳健康运行的行业能够给社会创造出更多稳定的就业岗位。

2月21日，南方日报AB08版刊文《房地产业开辟发展新路径》。张思思接受采访时表示：疫情危机提升了居民对居住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的需求及绿色健康住宅的需求，使人们对小区健康标准重视程度空前上升，对城市安全、居住环境、配套生活保障设施的需求会更高，例如非接触式水龙头、声控开关、感应设备、住宅内健身房、大卧室等需求增加。通风好、人口密度低、环境通透的“健康住宅”可能成为新的卖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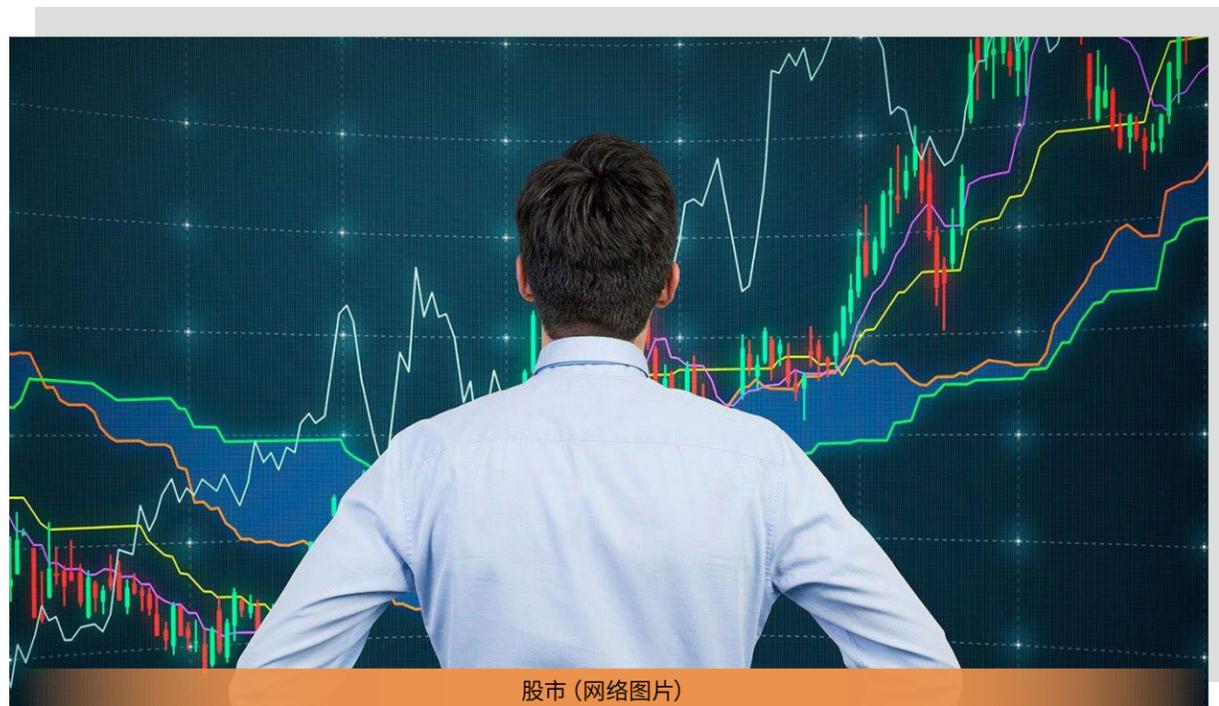


扫码查看详细报道



李润梁：股指期权在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作者：李润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股市 (网络图片)

自疫情发生以来，各种因素的作用使得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都出现了较大波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作为资本市场重要风险对冲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受到的关注尚不多。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一方面可以为投资者实现套期保值，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投机资本获取利润的工具。本文以沪深300股指期权为例，简要讨论其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希望对读者了解期权合约有所帮助。

市场背景

在金融开放大背景下，金融工具推出的步伐逐渐加快。沪深300股指期权合约是2019年12月23日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的，是我国境内首个指数期权产品。同日，还有沪深300ETF期权合约分别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交易。关于期权合约的含义，举例来说，考虑2月份到期的以沪深300指数的4150

点作为执行价格的认沽期权（代码IO2002-P-4150），当指数低于4150点时，它给予期权持有者（权利的买方）仍以4150点的价格卖出指数的权利。因此，实际指数越低，认沽期权的价格就越高。随着市场的变化，交易所按照执行价格和合约月份的不同逐渐丰富了和合约品种。

推出期权合约的目的固然是完善资本市场、丰富风险管理工具，且沪深300指数包含了沪深两市的不同公司，体现了风险分散，具有抗操纵性。然而，此次疫情带来的风险恰恰是系统性风险，影响整个市场而非个股。因此，指数整体大幅波动就是必然的了。如图1显示，年初以来，沪深300指数稳定在4150点左右，变动幅度很小，之后在疫情初期开始下跌，而2月3日开盘后，直接从4000点下降到3700点，跌幅7.5%。



图1. 沪深300指数（2020年1月2日-2020年2月11日）。数据来源：网易财经。

根据期权的基本原理，指数的下挫意味着认购期权价值的下跌和认沽期权价值的上升。为了具体观察市场的表现，笔者选取了2020年1月2日至2020年2月11日以来的合约月份为2月的所有期权合约，分别从整体和个体角度考察。

沪深300股指期权整体表现

我们首先分别绘制了包含所有不同执行价格的认购期权和认沽期权合约的总成交量、持仓量和成交额（图2）。可以看到，一直以来，认购期权的持仓量呈平稳上升趋势，而受疫情影响，假期前后的成交量出现了明显上升，之后波动式下降，说明投资者认为未来行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认沽期权由于合约价格和成交量的提高，成交额在2月3日增长约5倍，同日，持仓量小幅减少，是合约平仓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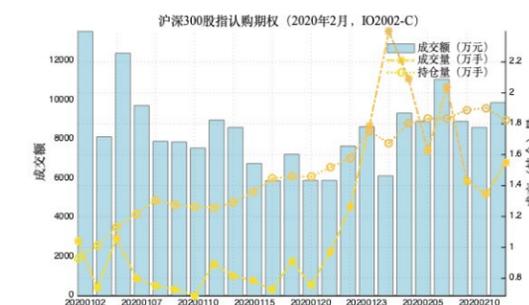


图2a. 沪深300认购期权（包含合约月份为2020年2月全部执行价格的合约）的成交额、成交量（单边计算）和持仓量（单边计算），2020年1月2日-2020年2月11日。数据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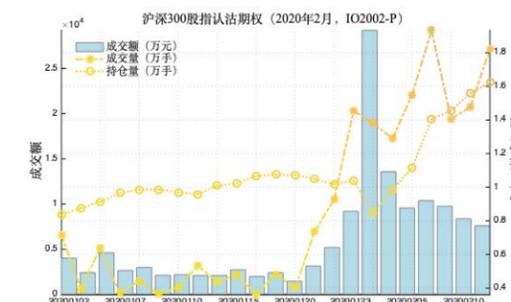


图2b. 沪深300认沽期权（包含合约月份为2020年2月全部执行价格的合约）的成交额、成交量（单边计算）和持仓量（单边计算），2020年1月2日-2020年2月11日。数据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

主力合约价格变动分析

合约价格的变化又如何呢？下面，我们以单个合约为例加以分析。通过数据整理，我们找到了自年初以来至今持仓量排名第一的合约，并分别绘制了认购和认沽期权的K线图，其中认购期权为IO2002-C-4650，认沽期权为IO2002-P-4650。以IO2002-P-4650合约为例，其2月3日的收盘价格（1063.4元）较1月23日收盘价格（667.6元）的上涨395.8元，幅度为60%。据此计算，作为认沽期权的持有者，每一手合约盈利约为39580元。

许多非主力合约的价格变动更是颇大，比如IO2002-C-4000合约假期前后的价格分别为85元和445元，变动幅度超过5倍。最后，由于4650点的执行价格远高于指数所能达到的点位，因此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认沽期权IO2002-P-4650作为实值期权价格变动受指数影响大，认购期权IO2002-C-4650作为虚值期权，其价格波动较小。



图3a. 认购期权合约IO2002-C-4650价格（2020年1月14日-2020年2月11日）。数据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



图3b. 认沽期权合约IO2002-P-4650价格
(2020年1月14日-2020年2月11日)。数
据来源：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

小结

股指期权合约甫一推出，就遇到了疫情的考验。对于此次疫情引起的市场震荡，如果投资者之前买入股票（包括指数、基金）的同时，以期货期权作为套期保值的金融工具，则能够减少现货市场的损失。然而，由于

1月份以来中美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得投资者的预期普遍乐观的情况下，有多少投资者当时真正有动力参与套期保值，确实难以判断。当然，由于交易限额制度的存在，我们应审慎评估但不必过度担忧投机资本对市场的冲击。

而今后，既然我们坚定了市场化改革与金融业开放的目标，在不断推出新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应该重视对民众金融知识和金融安全意识的普及，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乃至向民众推出更多类似对冲基金的理财产品，委托给专业人才运作，实现财富积累的共享，使期货期权市场作为保值功能的初衷更加显现。

虽然疫情对资本市场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正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才避免了潜在的更大的市场波动。希望此次疫情后，我们的国防、卫生和金融系统安全建设都能变得更加完善。

本文首发在“黄埔大道西观点”2月24日文章

【澎湃新闻】刘诗濛：疫情对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的影响

作者：刘诗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月初到2月中旬，正是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期间每天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与疑似病例都在几千人。据证券时报报道，2月9日—2月16日的一周内，武汉搜索“股票开户”的人排名全国第一。而此前，即1月29日-2月5日，武汉该项搜索排名仅位列全国第八。

为什么疫情越严重，人们的炒股热情越高？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20年2月24日启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应急项目，鼓励围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应对、治理机制、经济影响及社会管理等方向，开展国

家级别的研究项目。本文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经济学思考，探讨此次疫情对中国国民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可能产生的影响。

造成武汉地区民众普遍对股票开户兴趣大幅度提升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比较直接，在疫情特殊时期，最普遍的应对措施是隔离。而武汉作为中国抗疫的最前线，基本家家都处在隔离状态。由此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民众在居家过程中，网络线上活动时间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线上游戏与炒股等活动。2月6日，北京商报报道，手游《王者荣耀》疫情期间创下日流水20亿的纪录，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现象。因此，武汉作为大规模隔离区，大家将精力转移线上，入市炒股意愿会普遍增强。



疫情之后的街道（网络图片）

而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疫情对于民众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的直接影响。作为一次全国性的灾害事件，新冠疫情除了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大社会影响在于改变了中国国民价值观与风险偏好。上述新闻也是此次新冠疫情对于中国国民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具有重要影响的直接证据之一。而在经济学与社会学文献中，亦有很多研究发现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或个人苦难经历等均对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有重要影响。

根据对经济与社会学研究的了解，疫情对于中国国民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而根据受影响层次的不同，疫情对民众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的影响也不同。

这个层次的划分跟民众受疫情影响的程度深浅或所受苦难大小有关。从第一个层次上讲，中国大部分的居民在此次疫情中没有受到直接而严重的伤害，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影响，同时经受了较大的精神压力。我们认为，那些因为疫情而使经济利益受损的民众，家人或自己染病但病情较轻且康复过程顺利的民众，都属于这个层次。

在经济学文献中，有研究分析了这个层次的苦难会如何影响民众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上的经济学论文（Fan; 2020）发现，在早年亲身经历过“上山下乡”艰苦的民众会在投资行为上更加保守，对风险的承受意愿更低。同时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短期消费品，不那么愿意购买房屋等长期消费品，也不那么愿意做长期投资。其主要影响机制是，这部分民众的风险偏好与生活习惯由于其早期经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更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

此外，一篇发表在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的经济学论文（Malmendier, Nagel; 2011）发现，经历过大萧条等特殊时期的民众，在人生中会选择更少地去承受风险，选择更为保险与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方式与投资方式。

联系此次疫情，受到此次疫情直接影响与伤害较轻，但经历了较大精神压力的民众很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在投资行为上更为保守，即不那么愿意承受风险，并且可能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长期投资。

同时，尤其需要关注年纪较小的青年与儿童。在人生的早期有了苦难的经历之后，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会更为持久，对人生轨迹与人生观都会有一定的改变。此外，这种大范围群体投资消费行为的改变加总之后，将对长期的宏观经济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另一个层次，则是指家庭或个人生活因为此次疫情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有亲人去世，经历了直接而强烈的精神刺激的民众。这种层次的苦难，可以类比到其它一些较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等给人的行为与精神带来的影响。

一篇发表在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上的经济学论文 (Hanaoka, Shigeoka, Watanabe; 2018) 发现，2011 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后，受灾严重地区的民众变得更加愿意承受风险，并且更多的人开始参与酗酒与赌博。此外，男性所受的影响比女性更大，并且这种影响在多年以后依然强烈。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上的经济学论文 (Eckel, El-Gamal, Wilson; 2009) 同样发现，直接经历过美国 2005 年卡特里娜大飓风的美国民众变

得更加愿意接受风险。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民众在飓风中受到了强烈的创伤与极大的精神压力导致的。

在此次疫情中身处受灾严重地区的民众，尤其是武汉地区的民众，很多都有亲戚朋友或者社区的人染病的体验，有很多甚至经历过家人染病去世或者自己身染重病的痛苦。受到了这个层次的痛苦与精神刺激的民众，他们的心理状况与生活习惯很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按照所举论文中的发现，他们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偏好于接受风险，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上面提到的武汉地区在疫情爆发期间股市开户意愿全国第一的现象。而更为严重者，甚至可能会染上酗酒与赌博等不良习惯。

一国国民的消费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重大影响。因此，此次疫情之后，我们应当关注此次疫情在这方面的社会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做善后工作。可以预想，对受影响群众的灾后的心理恢复与帮扶工作应该是国家与社区此后工作的重点之一。

本文首发自澎湃新闻新闻网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13日文章

【羊城晚报】李承政 张亚楠：守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作者：李承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亚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国所有省市，截止目前波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影响之大、波及之远超过了国际社会的预期。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经取得良好进展，然而，疫情防控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能松懈。除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启动相应预案外，我们更应该建立长期应对机制，并从城乡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守住关口。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居环境担当了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关口”。

纵观人类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历史，即使它们不是首先爆发于农村地区，也不可避免地与农村地区息息相关。农村地区家庭畜禽养殖现象普遍，但没有做到人畜分离，也不会及时处理畜禽养殖废弃物，存在明显的传染病疫情隐患。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产生新的人畜共患疫情与新冠疫情叠加的复杂局面。



千村调查实地调研

近年来，广东省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珠三角、粤东西北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然而，农村人居环境中仍存在存在着一些明显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广东农村人居环境的整体面貌，更与此次疫情在农村地区的防控有着紧密联系。

一是人畜分离并不普遍，部分村庄仍未能实现人畜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广东农村居民畜禽养殖的比例很高，但人畜分离的情形并不普遍。2019 年广东千村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仍有将近 22% 的村庄的人畜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至附近的河流小溪等水域。虽然全省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不断提高，但仍有 8% 左右的农村家庭没有室内厕所，这些家庭要么依赖室外旱厕或简易厕所，要么依赖村庄公共卫生厕所。然而，村庄公共厕所普及率和无害化率均不是太高（行政村公厕普及率为 70%，无害化率为 92%）。同时，大约 18% 的农村无厕农村居民家庭至今仍然选择野外如厕模式，其中，粤西地区的无厕农村家庭选择野外如厕的比例高达 30%，农村重大传染病的粪-口传播途径仍没有完全阻断。

二是排污管道（下水道）系统尚未全面覆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仍任重道远。广东千村调查农户问卷的调查显示，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利用下水道系统收集生活污水的比例也不足 60%。山区和西翼地区村民通过专门下水道收集生活污水的比例更是低于 30%，更普遍的现象是将生活污水直接排至附近沟渠（48% 和 63%）。同时，山区和西翼地区的村庄设有排水排污管道的比例分别只有 32% 和 34% 左右。全省各地区村庄对生活污水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厂或村庄净化池）的比例大约只有 59%，目前为止，仍有不少村庄将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放至各类水域。如果农村地区污水治理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那么通过水这一渠道传播的疾病就会难以避免，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我省农村地区污水处理仍任重道远。

三是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已初步建立，然而垃圾分类落实难度大。2019 年千村调查农户问卷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设置了多处生活垃圾堆放点。大部分农村居民会将生活垃圾投放到垃圾池或垃圾车路过时投放至垃圾车（92.69%），农村生活垃圾“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的收运及处理体系已经基本成功运行。然而，全省分类收集村民生活垃圾的村庄占比仅为24%，将近90%的农村居民并不会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同时，新冠疫情对农村垃圾分类和收运处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医疗废弃物（口罩）倍增，混投、混装和混运现象将加剧农村疫情传播风险。总而言之，完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和分类体系有助于规避一些与生活垃圾处理不当相关的农村疫情风险。

农村人居环境既是基础性、长效性的农村重点工作，也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卫生防线。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将会为消除人畜共患传染病疫情隐患，并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力支持。因此，疫情期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科学引导，早日做到粪污无害化处理。在全国新冠疫情肆虐和广东农村地区实施“三清三拆”这一大背景下，鼓励农村家庭选择人畜分离的科学养殖模式，集中建设一批新的畜禽养殖专用房，确保农村住宅和畜禽养殖用房的完全隔离。并要求村民及时清扫畜禽粪污，避免人直接接触畜禽、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和分泌物。在畜禽粪污处理方面，应该与“农村厕所革命”中的人类粪污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等有效衔接起来，使得人和动物的粪便都获得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尽可能地排除新冠病毒以及其它传染病粪-口传播的可能性。



农村地区动物饲养环境

因地制宜，加快生活污水的有效治理。农村排污管道普及率低和生活污水处理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污水治理的人均成本较高。建议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方法和各种工艺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建设一批优质高效的村用污水处理设施。目前已有一些公司积累了分散污水处理、有机物分解等实用技术，地方政府需要因势利导，选择性地支持一些有潜力的优质公司，让它们脱颖而出，提升服务和技术水平。

全民参与，持续完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合理布局农村垃圾收集点，转运站和填埋焚烧厂，坚持生活垃圾就近就地就农利用，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的同时，大大提升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 and 资源化利用率。同时，快速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通过基层党组织宣传垃圾分类的优点，图文并茂地在村民中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疫情期间还应倡导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废弃物分开独立投放，并要求转运过程做好防护。

“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这是形势所趋、任务所迫、责任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团结和引导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将对农村疫情防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首发在羊城晚报旗下APP“羊城派”以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17日文章

人口流动大数据对疫情防控的启示

作者：史炜（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邱筠（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陈希（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



人口流动（网络图片）

我国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已持续向好。3月12日，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的本轮疫情的流行高峰已经过去。同时，疫情在欧洲仍呈现快速扩散的情况，防国际输入转化为本地传播成为我国当前疫情防控的一个重点。

在疫情防控期间，一些掌握大量用户个人数据的企业给出了不少基于大数据预测疫情风险、优化防控政策的方案。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三大移动运营商提供个人过往轨迹查询，这样疫情的防控强度可以视个人的旅行经历而调整。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平台（qianxi.baidu.com）提供全国300多个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规模的指数。度量区域间人口流动的数据包括人口普查等调查数据和基于机票、火车票的订票量推算的旅客数

据。现在无论人们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出行，手机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相对于以上这些数据，基于手机信令或app计算的人口流动数据有可能更为及时和全面。一些近期研究使用基于百度迁徙的人口流动数据来预测新冠肺炎的传播。

大多都会赞同人口流动会加速传染病传播。在此基础上，我们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国的防控政策如何改变了由人口流动产生的疫情扩散。



图1: 百度迁徙网站截图, 3月15日迁入广州的来源地分布

回溯新冠肺炎的传播

我们的回归模型的设定基于关于传染病传播的经济学文献, 考虑了疫情的外部输入和内部扩散。对于武汉以外的城市, 人口流动会输入一些感染者, 进而导致本地的密切接触者感染。随着国家的疫情管控政策和公众相关意识的加强, 疫情的传播形势是变化的。因此我们以14天为一个滚动窗口, 回溯1月19日到2月15日这4周间武汉以外的疫情传播态势的变化。数据来源是国家 and 各省卫健委公布的每日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第一例武汉以外的确诊病例在1月19日。因为武汉的疫情的烈度和形势都显著不同于其它地区, 我们的分析样本没有包含武汉。我们的工作论文有详细的技术细节。

上图的系数反映了来自武汉的人口流入对于疫情传播的影响, 佐证了使用人口流动数据来预测疫情风险的合理性。比如, 左图第一个数值是0.0049, 这表示如果从武汉到某城市的迁徙指数是100, 武汉每周平均多增加1个病例, 会导致这个城市的病例数在一周内平均增加0.49个。这个数值是由1月19日(横轴的日期)开始的14天样本估计的。图中还标注了95%置信区间。根据总出行人数估算, 1万人的迁徙指数是0.136。因此一个粗略的估算是如果从武汉到某城市平均每周有1万人, 武汉每周平均多增加1个病例会导致该城市在一周内平均增加0.067个病例。左图反映了1周的滞后效应, 右图反映了1-2周的滞后效应。

通过比较使用不同时间样本的估计值, 可以发现总体来说因输入而产生的病例的速率在减缓。在1月下旬, 与武汉人口流动密切的城市受武汉疫情影响的滞后时间为一周; 而到了2月初, 滞后的时间推迟到了1-2周。这就是所谓的“压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 即延缓了疫情高峰到来的时间, 降低了疫情高峰时的严重程度, 从而使得医疗机构和公众能够更好地应对。这说明自1月下旬以后, 武汉以外的城市有效地降低了输入病例的风险。再加上武汉和湖北的出行限制, 疫情输出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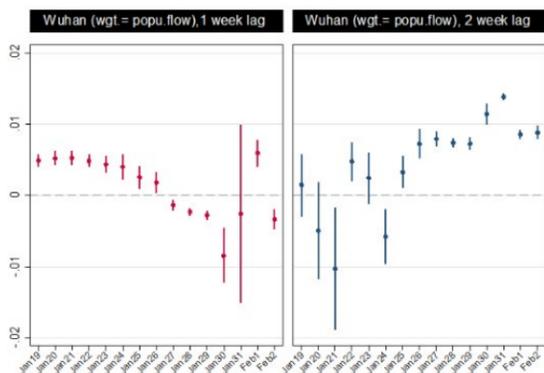


图2: 人口流动与疫情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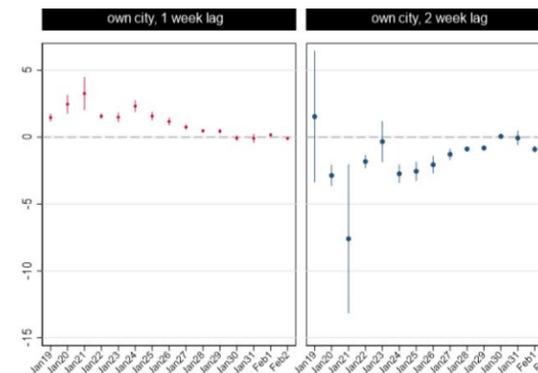


图3: 疫情的本地传播

在疫情的本地传播方面, 左(右)图展示了本地平均每周增加1个病例, 在1周(1-2周)内的滞后效应。基于1月19日开始的14天样本, 1个病例在1周内增加了1.465个病例。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传播速率一度增快。但从1月下旬开始, 本地传播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少系数变得较小甚至为负, 反映了政府和公众对疫情的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当前新冠肺炎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加入到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中, 韩国、意大利等国已经开始使用隔离、封城等应对措施。本文的分析结果不仅对我们理解新冠肺炎的传播有帮助, 对其他国家应对当前疫情也有启示。

经济发展的双刃剑

武汉是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特大城市由人口集聚带来的疫情风险得到了关注。我们分析了经济社会状况对疫情传播的调节作用。主要发现在经济更发达的区域(以人均GDP衡量), 疫情传播的速率更快。更丰富的医疗资源(以医生数衡量)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速率。

传染病在经济发达的区域更容易传播的一个可能原因是经济活动使得人群间的交互更频繁。然而, 近期的一篇追溯不同国家发展历程的论文发现, 传染病的高发使得一些地区的社会组织较为松散, 抑制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 这次疫情也启发人们去思考公共卫生、生态安全对于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基于实证证据优化分区疫情管控

在医学领域, 有个概念是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 指出医疗决策应基于实证证据, 同时考虑证据的质量、病人的意愿等因素。同样的想法也可以适用于分析如何优化疫情管控政策。从1月底开始, 我国所有省份和直辖市都执行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 各地出台了很多管控政策, 比如限制出行、取消大型活动、要求佩戴口罩等。考虑到这些防控政策的经济社会成本不一, 在我国当前采取分区防控的背景下, 如何优化不同区域的防控政策需要首先评估这些管控政策的有效性。

随机对照实验能够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在分析疫情传播方面, 随机对照实验一般是不可行的。同时, 人们不会静观疫情扩散。在做政策评估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虽然不能进行随机实验, 但经济学的工具箱里有很多可用的工具, 相信实证经济学研究会为公共卫生机构优化分区管控提供支持。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23日文章

外国人居留条例解读

张振江：外国人永居条例体现了大国的担当 ——专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 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



永久居留身份证（网络图片）

背景：

近日，司法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引发广泛讨论，其热烈程度可能远超发布者的预期。针对此次的争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采访了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跨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张振江教授，以下为采访全文。

1、您如何评价本次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意见稿？

张振江：比起2004年公安部 and 外交部共同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此次的《意见稿》已经细化了很多，更加完整、明确和规范。

2、您认为此次意见稿的出台是基于什么背景？

张振江：首先，一个大的背景是：现在的中国比起十几年前有很大变化，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受瞩目，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这个条例的出台就更加

必要，随着我们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我们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一定是开放的，无论是作为一种姿态还是大国的担当，我们应该接纳外国人来居住、生活甚至永久居留。纵观古今，无论是古罗马还是现在的美国、欧洲国家，当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如果你在接纳人口方面还是封闭的话，是不可行的。



而从互惠的角度来说，世界上还有6000多万的华侨华人，他们也需要当地国家的接纳、融入才能更好地发展，当地国家也会给予他们一定的身份。这是整个全球化和中国发展的背景。

另外，我们知道全球经济发展都遇到了瓶颈，如何进一步创新？关键是靠人才。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在全球范围吸引、接纳人才变得尤为重要。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引进外资、引进外智的政策，包括我们熟知的“千人计划”等等，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总体来说，意见稿的出台很有必要。

3、如果《意见稿》真正出台，哪些群体收益最大？

张振江：肯定是愿意来中国的和已经在中国很多年却无法获得身份的人是最直接受益者。同时，也能吸引一些看到中国发展机会，愿意来淘金或者加入中国经济发展建设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与我国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

4、《意见稿》一出台就产生了很多争议，您怎么看？

张振江：有争议很正常，但是这次的争议比起2004年更加突出。我想有三点原因：一是因为通讯技术的发达，现在网民利用手机的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平台可以随时浏

览信息、随时发声，比起十几年前，民众的声音更多，所以显得更加有争议。二是的确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到了中国，我之前研究过在广州的非洲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留学生、商人、跨国企业的人员等等，他们存在的现实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是与条例意见稿抛出来的时间有关。此次新冠疫情大家隔离在家，有更多时间花在手机上来关注新闻，而且随着疫情开始全球范围传播，民众更加关注外国问题、国际合作、中国的外交政策等等，因此民众对这个问题就更加敏感。我认为，这种积极的讨论是好事。但是我们要对这些意见客观地分辨，比如有一些人未必真正读完了完整的条例，也有人仅仅是看到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永居的题目，就联系到了外国人来中国抢饭碗的恐慌。

实际上，我们之前在对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时候，其实已经给予他们国民、甚至是超国民的待遇的，所以这个《意见稿》对现状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从2004年的管理办法出台后，一直到2014年，据统计十年间有7000多人拿到了永久居留的资格。这个数据比起中国往外走的人来说太少了。而且大部分获得资格的人都是我们需要的人才，本次的《意见稿》也界定的很清楚，哪些人才是我们需要的等等这些界定是在以前的基础上细化的。

对待民意，我建议公安部应该借这个机会，邀请一些包括学术界、企业界以及相关的政府等与引进外国人才相关的专业人士和部门，召开专门的听证会来交流，可能会吸纳更多更合理意见。第一，公安部不应该因为目前网上民意的反对而中断决策。第二，我们也应该筛选一些合理的意见去改进，比如投资人民币1000万以上这个数额的界定等。第三，多听取专业人士的声音。希望这个《意见稿》的出台，能够成为我国政府决策、立法等改革先行的样本，有一个草稿出来之后，广泛听取意见，开放地让各界人士陈述意见，这将会是对中国决策体系的一次很好的改革。

5、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如何顺应潮流，进一步做好人才引进工作？

张振江：我认为这个政策一旦出台后，谁会用好这个政策最重要。前段时间我去深圳前海，他们也在探讨投资移民的管理条例，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以在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大湾区作为一个最开放、最需要人才

且有很好基础的地方，更应该先行落实。那么在落实的过程中，是否可以进一步申请优惠政策，比如投资1000万的准入资格，大湾区能否再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等等。我建议大湾区可组织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智库等来针对条例进行研究和细化。一旦国家公布，我们就马上开始落实，走在前面去。同时，中国的政策一般都有试点，如果提前准备，则可快速出台相应政策。

6、如果《意见稿》出台是否会冲击国内的劳动力市场？

张振江：我认为完全不用担忧，大家都有比较优势。经济发达的地方一定会有大量外来人口，但是它会有分工。广东的经济发展也是依靠大量国内的外来人口。现在中国是全球布局的，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自然会进行调整。同时意见稿里提到的都是我们稀缺的高端人才，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冲击。

7、也有评论提到了近几年来高校留学生管理乱相问题，您怎么看？

张振江：中国有这么多大学，即使有教育部统一的规定，但是每个学校在实施的过程中，对规定的理解以及学校的治理水平都参差不齐，其实也有大量学校管理得不错。整体而言，中国能够在短期吸引到这么多留学生来，的确需要一些优惠政策，当中会引发一些问题，这都是探索的过程。有问题发现了就改，但不能因为局部的问题来否定整体。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中国近年来对留学生的吸引与管理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8、《意见稿》如果出台，是否是解决跨国婚姻的契机？

张振江：这个条例就是来解决问题的。现在确实存在很多跨国婚姻，但是因为缺乏身份而对当事人造成很多具体的困难和问题。退一步讲，如果外国人真的愿意与中国人结婚，中国人也愿意这样，政策就应该想办法处理。当然，很多人担忧通过假结婚拿身份等现象肯定会出现。但我们可以管理，我们要配备严谨的申请手续、审查认证、监管流程，就可以很好地管理。如果很多人真的想通过婚姻来拿到中国身份的话，这本身也是好事，说明中国是有吸引力的。

9、我们应该吸取跨国移民管理的哪些经验？

张振江：《意见稿》的出台本身就在证明中国在解决跨国移民问题。2016年，我们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IOM），其实是在充分吸纳别国好的做法。就拿跨国婚姻来说，婚姻是基本的人权，如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很奇怪，所以我们要学习国际上好的经验。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中国人口众多，且本身并非移民国家，我们现在的政策也并非大量引进移民，我们是有控制的。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要关注跨国移民的问题，譬如目前欧洲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因为外国难民的涌入引起的。我们会不会有？其实这也是很多网民的担忧。

简单而言，其实中国在国际移民管理方面也有很多经验，诸如我们过去接收了很多华人难民，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和学习，共同做好全球治理。现在我们出台这个条例，既是中国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也是大国的姿态与担当，只有保持与国际社会持续良好的互动，才能相互促进，逐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24日文章

跨国“婚姻”在农村：关注外籍女性配偶的长期居留困境

作者：韩嘉玲（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讲座教授）

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农村外籍妇女（网络图片）

2020年2月27日，司法部发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外国人满足就业、婚姻、社会贡献、投资、家庭团聚等一定要求，可以申请中国的永久居留资格。

本次意见稿的第19条提出了“外国人因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的，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有舆论认为这是一条会导致移民漏洞的兜底条款，但对于部分农村地区长期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外籍配偶”而言，它却可能是福音。

上世纪90年代始，因地理毗邻、地区经济差距及人口贩卖等因素，不少东南亚地区女性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我国境内，与中国农村男性组建家庭。中国公民与东南亚地区女性的跨境婚姻以发生在广西、云南毗邻地区的边民婚姻为主。但除了边民婚姻外，在我国沿海及内陆地区同样存在来自东南亚地区跨境事实婚姻现象。笔者2019年在南方沿海地区S省的调研发现，S省的东、西、北、南及中部区域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一定数量的跨境事实婚姻。在S省A县的调研显示，当地不完全统计的外籍女性“配偶”人数在上千人，分散在各乡镇中，她们在当地定居时长达20年以上。

对于“嫁入”中国农村的外籍女性而言，她们一度面临着沟通困难、风俗不同、融入受碍、子女入户受阻等困扰。虽然这些问题虽然随时间推移及政策调整得到一定解决，但在今天，农村跨境婚姻家庭面临着新的困境。本文将结合一位外籍“配偶”阿云的生命史展开分析。

缺失有效证件的“非正规移民”

阿云来自越南北部河内附近的农村，家庭世代为农，一家八口人，她排老三。1991年，29岁的阿云（化名）被邻居告知偷偷跨越边境去中国买布，再拿回河内卖，可以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阿云听信了了邻居，却不知道从此与家人离别。

直到意识到自己被拐卖后，阿云已经身处中国南方沿海某省的农村，并被迫嫁给当地的农民。将近30年过去，阿云也接受了这一事实，经历了两段婚姻，并育有两个女儿。虽然两任丈夫都对阿云很好，但丈夫都存在贫困或残障的特点，为此阿云不仅在家里承担起家务照顾等工作，还要做农活。阿云没有家里的联系方式，也没有越南方面的有效护照。因此，他们无法办理结婚证并取得有效居留许可。这些年来，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到县里贩卖荔枝。

随着中国进一步加强了边境管理工作，以及东南亚国家严厉打击人口贩卖现象，阿云类似遭遇在今天逐渐少见，但阿云也成为遗留于农村的历史问题。由于她们当年多半通过跨境偷渡的非正规方式入境，属于非法入境及非法居留的“三非人员”，该群体在国际上也被称为非正规移民（informal migrants），或缺乏有效证件的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她们在输出国的有效证件也早遗失或过期，陷入无国籍身份的处境。有效证件的缺失使得她们面临居留非法、出行困难、子女入户、妇女权益受损、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

没有婚姻法理关系的“事实婚姻”

2000年初，阿云的第一任丈夫因病去世。为了维持生计，阿云只能带着大女儿改嫁到隔壁村，并与第二任丈夫生了小女儿。阿云与两任丈夫的婚姻都没有进行登记，这也意味着，阿云的事实婚姻关系并不受我国婚姻法所认可。另一方面，虽然当前我国涉外婚姻登记程序

及条件有所简化，但现行涉外婚姻登记程序其必要条件在于提供有效的证明，缺乏任何身份证明的状况也阻碍了外籍“配偶”进行婚姻补登记。

由于无法在法律上确认婚姻关系，即便是共同生活并生儿育女超过数十年的跨境婚姻家庭，也不能依据家庭团聚为由申请居留。更遑论进一步根据意见稿中的第17条的“家庭团聚需要”申请永久居留资格。目前，国内出入境部门对于这一群体的处理办法，是与原来国籍的外交部门确认身份，外籍妇女需要取得母国的有效证件，根据此证件补办婚姻手续，然后申请家庭团聚的居留签证后，她们才能名正言顺的居留在国内，洗脱“三非”人员的身份。但对于这群年纪渐大，经济状况较差，且文化水平相对不高的女性群体而言，该过程理论可行，实则艰辛。这些女性陷入了一种“没有合法入境证明，难以办理婚姻登记，无法取得合法居留权限”的循环中。

面临养老需求的外籍“母亲们”

阿云告诉我们，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取得常住居留证明，摆脱“黑户”身份。虽然自己坦然面对无居留身份带来的困扰，但是她不希望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女儿。她说，在当地，女儿会因为母亲是黑户，很难找到婆家，或为婆家看不起。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中，解决了阿云们在国内与中方配偶所生育子女们的户口问题。地方政府可以依法为我国公民与无国籍人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登记常住户口，但现有政策尚未为“阿云们”给出解决方案。这也是当前农村地区外籍“配偶”进退不得的两难局面：女性最初作为受害者而被迫远嫁异国，大多数在生儿育女后逐渐融入当地，譬如熟练掌握当地方言；另一方面，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以系统解决她们的有效身份问题，从而导致真正的社会融合困难重重。“身份”成为不断衍生出新问题的根本问题。

2019年笔者去探望阿云，她已经58岁了。家务劳动、家庭照顾与农业生产的三重责任下，她患有风湿等常见慢性疾病。为了照顾身体残障的丈夫及未成年的小女儿，阿云日常要下田干农活、采栽荔枝维持生计。

这些外籍“配偶”在农村跨境婚姻家庭中，是母亲及妻子，也是负责家庭生产的顶梁柱。阿云在村里的“姐

妹”，同样是来自越南的另一名外籍“配偶”阿宁，在务农外，还偶然在邻村的工厂里务工，或到镇上帮工来补贴家计。

随着年龄渐大，摆在“阿云们”面前的困境，是她们的养老问题。目前，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主体是个人，而不是户。这些外籍女性“配偶”无法依附丈夫或子女参加农村养老保险，被排除在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外。作为非本国公民，中国也没有义务承担这些非正规婚姻外籍妇女的养老责任。所以，她们只能转向传统的家庭照顾。阿云大女儿在初中毕业后就留在镇上打工，这样才能随时回家照顾父母，但当地工资只有两千出头。面临养老需求的外籍“母亲们”，她们的养老负担需要其中国子女来承担，又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基层眼中的“涉外治理挑战”

“阿云们”经历的特殊之处在于：种种因素叠加起来的状况，也对目前的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挑战。根据S省A县当地扶贫部门的摸查，1000余户外籍“配偶”家庭中有近700户为贫困家庭。换言之，这些跨境婚姻家庭大多属于目前农村精准扶贫所要关注的对象。虽然当前这些家庭被纳入贫困户、低保户的范围，但由于无身份证明，外籍女性“配偶”无法被登记在扶贫系统中，不能收益于目前的社会救助体系与扶贫攻坚工作。她们只能通过丈夫而间接获得支持，这也使得对相应贫困家庭的救助力度有所弱化。随时间推移，一旦家庭中的丈夫故去或子女分家，同时外籍“配偶”因老龄化失去劳动能力，这种无国籍、无户籍的身份将使她们陷入生活来源无保障的困难中。驻村干部向我们坦诚：地方固然可以通过灵活帮扶解决她们一时的困境，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等上级拿出办法。

妥善用好“意见稿第19条”，探索合法居留的解决方案

本次意见稿明确了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利的一些准入资格，但主要面向高层次、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外籍人才。但与此同时，第19条也提出了“外国人因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的，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这一条兜底条款为破除现有农村跨境事实婚姻的身份困境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期待，当前农村地区外籍妇女的居留状况问题应尽快得到上级部门的关注并解决。从治理的角度来看，无国籍无户籍人员的身份给地方基层组织带来人口管理的死角与困难、公共服务提供的屏障，同时也影响了脱贫；从家庭的角度来看，这些外籍“配偶”虽然属于非法居留，但是也都在我国生活二十年或更久。她们既是中国公民的妻子，也是中国公民的母亲，为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无论从人道主义立场还是国家治理需要来看，有关部门应考虑解决农村外籍女性“配偶”的居留需求，例如给予常住人口身份。唯有解决其身份问题，她们所面临的出行、养老、医疗及社会救助等问题方能迎刃而解。

最后，我们也在解决农村跨境事实婚姻问题上给出一些建议。首先，是尽快尽早摸清非正规跨境婚姻人口情况。结合我国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契机，统计部门应把握我国当前农村地区的非正规跨境婚姻情况；其次，推进非正规跨境婚姻登记的合法化。鉴于无国籍无户籍人员所存在的种种困境，及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的非正规跨境“事实婚姻”现象，民政部门应对已经存在的事实婚姻状况进行核实并开展合法登记手续，实现这些婚姻关系的法理化。再者，开展兜底救助工作。面对无国籍身份而存在事实婚姻的困难跨境婚姻家庭，尤其是丧偶、家庭成员疾病、子女尚处求学阶段等状况而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大龄外籍“配偶”，应鼓励地方部门采取灵活方式开展救助，通过社会救助来解决她们可能面临生计困境；最后，在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有关部门应强化国际多边合作，严厉打击跨国人口贩卖。

回想起最后与阿云的交谈，我们问她：假如没有来中国，你觉得你的人生轨迹会是如何？阿云迟疑了下，她说，假如没来中国，或许会和父母在一起，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出嫁。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网以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25日文章

经济学如何看待移民问题？

作者：谢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移民（网络图片）

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民众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由于中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对于引进国际移民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话题，并无太多可借鉴的过往经验，针对性的国内学术研究也相对较少，因此笔者从西方发达国家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成果出发进行经验总结，试图从中获得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启示。

国外文献对于移民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移民对于接收国经济产生的各方面影响，第二是移民在接收国的同化（assimilation）以及劳动力市场表现。

民众对于移民问题的一个主要担忧是：当移民引入后，移民是否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和本土居民展开竞争使得薪资水平下降，或者对本土居民的就业有挤出效应导致失业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最简单的经济学供给-需求理论框架下似乎显得“一目了然”：引入移民导致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平移，需求曲线不变化，因此均衡工资降低，虽然总体工作数量变多，但本土居民的工作

数量减少。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是怎么样的呢？作为相关研究的经典开山之作，David Card (1990) 利用 1980 年导致古巴移民大量涌入迈阿密的马列尔偷渡事件 (Mariel Boatlift) 作为自然实验进行研究，发现古巴移民并未对迈阿密劳动力市场中本土居民的工资和就业水平造成显著影响。此后，诸多研究对各国不同时段的移民进行考察，大部分均未发现移民对本土居民的薪酬和就业有明显的影响 (Card, 2001; Dustmann et al., 2012; Foged and Peri, 2016 等)，只有少量研究发现低技能移民对同等技能水平的本土居民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Borjas, 2003 等)。2016 年在美国国家学院关于移民的经济与财政影响的报告 (Blau and Mackie, 2016) 中，移民问题的研究专家们达成一致结论，认为高技能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低技能移民对本土居民工资和就业状况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实证发现和经济学直觉不符的原因是多层次的。首先，由于移民可能同时增加了国内消费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同时右移，使得新的总体工作数量增加的同时均衡

工资并不会明显下降。另外，移民和本土居民可能由于掌握技能集的区别形成了互补性，各自在生产中更趋于专业化，因此不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直接的竞争，反而能相互提高彼此的生产力 (Peri and Sparber, 2009; 2011)。例如美国高技能移民更多从事侧重数量和分析的工作，如程序员工程师等，本土居民则由于语言优势更多承担信息交流和协调管理为主的工作。最后，移民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冲击可能使得企业在生产中采纳不同的生产技术，对要素投入和产出组合进行调整 (Dustmann and Glitz, 2015; Lafortune et al., 2015; Clemens et al., 2018 等)。Lewis (2011) 发现美国 1980-1990 年代制造业通过调整自动化生产设备投入来吸收低技能移民的劳动供给冲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 1920 年代美国制造业企业通过改变资本投入和生产规模来应对移民配额法案导致的负向移民供给冲击，导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明显改变。这些企业对生产方式的调整可以吸收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冲击，也会使得最简化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的预测失效。总而言之，移民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取决于经济结构的特征和市场各主体的调节能力，因此这种影响的效果不是固定的，难以一言蔽之。这同时也提供了政策启示：对于移民政策可能造成对本土居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针对性的关于劳动力市场和企业的配套政策来缓解和消除。

研究显示移民——尤其是高技能移民——对接收国经济的各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益处。美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移民大国，其经济发展从多次的移民大潮中受益匪浅。在大移民时代 (1850-1920)，欧洲各国移民不受限制地大量涌入美国。Sequeira et al. (2019) 等人研究表明，这个时期的移民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减少了贫困。二战期间，德国以犹太人为主的高技能人才前往美国避难，对美国的科学和技术进步影响深远。Moser et al. (2014) 利用美国专利数据研究了德裔化学家对美国化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发现有德裔化学家进入的领域吸引了更多本土科学家进入相关领域，并导致该领域的专利数量增长大约 30%。在美国当下的移民制度中，通过学生和工作签证的 STEM 移民也表现出比本土居民更强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对美国当代科技创新有显著的贡献 (Hunt and Gauthier-Loiselle, 2010; Hunt, 2011)。此外，Cortes (2008) 和 Cortes and Tessada (2011) 研究显示，美国的低技能移民降低了服务性商品价格 (例如家政)，并促进了高技能本土居民的劳动供给。综上所述，移民从不同方面为经济提供了更强的增长动力，实证也发现移民提高了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Peri, 2012)。由于现代的经济增长更为强调人力资本的投入，所以移民

选择制度应该更多以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为标准进行合理设计，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移民的同化 (assimilation) 能力，即移民是否能成功融入接收国的社会生活和劳动力市场，也是移民研究中的一个焦点。美国社会被称为“大熔炉”的原因就是由于部分学者认为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移民均可成功融入美国社会 (Glazer and Moynihan, 1963)。移民的同化之所以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和政策关注点，是由于移民在新社会中是否能适应融入不仅关系到移民自身生活的福利水平，更影响到移民对接收国经济的贡献能力。衡量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同化程度的方式，一般是考察移民是否能获得与其人力资本水平相称的工作和薪资水平。一个影响到同化的重要因素是移民是否能熟练掌握居住国的语言能力 (Chiswick and Miller, 2007; Cohen-Goldner and Eckstein, 2008 等)。笔者对美国高技能移民的研究发现，英语熟练度和高技能移民在美国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正向相关，这种相关性在工作内容更强调沟通和表达能力的非 STEM 移民群体中更强。另外，外部环境能否给移民提供宽松包容的社会氛围也是移民能否快速融入社会的重要原因，包括公众态度等非正式因素以及移民相关的社会制度和法规等正式因素。负面和歧视性的公众态度和制度可能加剧移民同化的客观障碍，也使得移民融入社会的主观意愿下降，因而进一步加剧这种歧视和敌对，形成恶性循环。例如 Gould and Klor (2016) 研究显示 911 后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敌视态度使得穆斯林移民融入劳动力市场变得更为困难。类似地，Steinhardt (2018) 的研究发现 1990 年代德国针对移民的排外性暴力行为不仅减弱了德国移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学习德语的努力程度，更增强了他们的返乡意愿。从制度角度检视该问题时，Gathmann and Keller (2017) 发现，当 90 年代德国移民系统改革使得移民能更快获得公民资格后，女性移民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一个反面的例子则是美国 19 世纪末的排华法案。笔者的研究发现：排华法案中针对中国人的一系列歧视制度，对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社会融入造成了巨大障碍。

因此，完善的移民系统不应仅限于对移民的筛选和准入原则，后续关于移民居留的配套制度和如何协调本土居民和移民关系的政策，对于移民引进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26日文章

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意见稿的思考

作者：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移民（网络图片）

20世纪以来，中国跨境流动趋势主要是从国内走向世界，大量海外华人侨胞定居世界各国，近1000万中国出生的移民目前居住在中国以外地区。随我国现代化进程，在华发展机遇越来越大，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来华交流、工作并定居。据联合国数据，2017年常住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口将近100万。如2018年《国际移民报告》指出：“中国正在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国际移民接受国”。

2020年2月27日，司法部发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外国人满足一定要求，可以申请中国的永久居留资格。本次意见稿是进一步在2004年《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2013年《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细化的外国人永居管理制度，并补充既往法规在细节上的不足。针对目前一些舆论对意见稿及在华外国人所存在的一些误区，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冲击就业？涉外劳动力市场受严格准入管理

一些观点认为，外国移民将冲击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并引用美国、欧洲的移民现状来论证外来移民会抢占本地居民的就业岗位。这是典型的“稻草人谬论”，曲解了现有的涉外管理体制。

首先，进入我国的外国人大多处于属于专技型人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建国以来，外国人来华以政治性目的为主，由驻华外交人员、苏联专家、友好国家派出的海外留学生及政治难民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来华转向以经济、交流学习为目的。除外交人员外，由三资企业人员、外籍教师和技术专家以及各类留学生构成。例如，在广州的韩国、日本来穗人员以高端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为主，美国来穗人员以华人和教师为主。

其次，来华外国人相当比例来自发达国家。经典移民理论认为，人口流动顺序常常是从欠发达地区前往发达地区。但从广东情况来看，广东常住外国人相当比例来自于发达国家。2014年前五位来源国为日本、韩国、美国、委内瑞拉和印度，约4.7万人，占常住外国人总数的49.5%；截至2017年底，广州全市实住外国人8.27万人中，来自欧美日韩发达国家人员占比达到46.9%；从包含短期性来粤的外国人临住人口数据来看，2014年临住外国人总数388万人次中，前五位来源地为日本、马来西亚、美国、韩国和新加坡，约161万人次；来自非洲国家约41万人次。

再者，来粤谋求发展的外籍人员中，非裔外国人近得到广泛关注，但现实数量并不多。由于种种原因，广州得到了“巧克力城”等外号。但实际上，来粤或来穗非洲人员以临住为主，常住极少，并以在华留学生居多。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9月，广州在住非洲国家人员1.5万余人，常住非洲国家人员5000余人。根据广交会数据，2016年近三年来，从广州出入境的外国人保持在500万人次/年，其中非洲国家人员在近60万人次。目前，在穗非洲人员以从事商贸活动为主，形成了一定的族裔经济特征。例如，常住在穗非洲人员往往在广州拥有商铺或办公室，从事批发、物流、服务等中介性质的工作。来穗的非洲商人依赖于这些非裔“坐贾”所形成的族裔网络，前往珠三角地区或内地各城市从事商品交易。



非裔外国人在广州

最后，我国涉外劳动力市场受管制，准入门槛严格。虽然流程有所简化，但我国外国人来华就业的管理依旧非常严格。2017年修改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规定了来华就业的外籍人员需要办理的就业许可证明，由外专局负责管理审批。就业许可制度本身就是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保护的体现。目前就业准入许可遵循“鼓励高端、控制一般、限制低端”的控制原则，并采用“标准符合”和“计点积分”两种途径对来华就业的外国人进行分类管理。就“标准符合”来看，来华发展就业的外国人被分成以下三类：外国高端人才（A类）、外国专业人才（B类）以及其他外国人员（C类）。对不同类型的外国人，国家亦根据市场需求，有相应的配额指标限制。换言之，在“准入审批”与“分类引进”制度下，哪些外国人可以在境内就业本身就是选择性的结果，有关冲击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观点并不会成立。

内外有别？争议背后是深层次的的社会问题反映

为什么意见征求稿引起了社会舆论如此大的争议？截至到3月4号，相关话题的阅读量仅仅在微博平台就超过了46亿。争议背后是社会对经济政治问题上可能存在“内外有别”不平等对待的担忧。

有观点引用外国人在我国违规而不能得到及时处理的报道，并产生了有关“特权”争论。这一问题其实牵涉到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不好管”，反映现有涉外治理体系存在不足。目前在签证发放、边防口岸查验、入境管控三个外国人管理环节，分属于外交部门、公安部门及地方部门。这使得在外管工作常常需要多部门参与，容易产生涉外管理服务上“边界真空”与“九龙治水”局面。新闻媒体上也不乏外国人在我国违法违规而不能得到及时处理的负面报道。另一方面是“管不好”，则涉及到涉外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涉外管理服务牵涉到与不同国家地区、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外国人进行打交道，本身对一线基层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能力要求。目前基层涉外管理人才缺乏，处理相关问题上存在不知所措的困境。为减少纠纷或麻烦，有时会作出息事宁人，大事化小的不当举措。面对涉外管理服务存在“不好管”也“管不好”问题，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加强涉外治理能力及其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而非舍本逐末，一律反对以了之。

也有观点认为依据意见征求稿，外国人较国人而言更易取得城市长期居留的身份，甚至是获得“超国民待遇”。对于这一问题要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目前意见稿中拥有永久居留申请资格的外国人大多属于高层次人才，给予政策优待是世界各国通行做法。随着我国“人口红利”优势下降，人口质量在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则凸显出来。用优渥的条件吸引人才是世界通行做法，这也是为何我国当前各大城市近年来出台了各种人才吸引政策。例如，广东对持有人才优粤卡的高层次人才，无论何种国籍身份，在户籍办理、医疗服务、停居留和出入境、交通服务等方面都给与优惠便利。

而另一方面，对国民身份/待遇的争论，其实反映人们对现有户籍制度等“存量改革”的期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诸多历史欠账。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为标志，居民依据出生地不同被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同类型，并享有不对等的政策待遇。虽然，近年来各地在推动非户籍人口城市落户等方面颇有建树。但现实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享受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依然是漫漫长途。例如，2020年度广州城乡居民医保新生儿参保对象，依然仅限本市户籍的婴幼儿；作为对比的是，佛山更进一步，有条件地允许非户籍的“随迁儿童”参保并提供补贴。如果说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的出台是增量改革，那么，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则是解决历史欠账的存量改革。消除大众争议最有效的方式则是确保增量与存量改革并行不悖。

小结：我们如何讨论公共议题？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是《左传》中政治家子产对公共舆论的看法。本次意见稿发布后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尊重社会对公共议题的意见以及允许多元观点的并存非常重要。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所担忧，现代性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与原子化社会的形成，其结果就是个人对公共事务的政治冷漠。避免冷漠最好的方式就是允许、并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

此外，又如何从参与的冷漠陷入另一种激情的狂欢？当前在全球移民议题上，常常陷入后一窠臼。笔者认为，在广开言路的基础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应建立在实事求是与求同存异的共识之上。不过遗憾的是，本次很多争论其实经不起实证的推敲，并极易上升到“扣帽子”之攻讦。

最后，我们应该从什么立场出发去认识公共议题？“曼德维尔悖论”是一种常见的观点，即认为：私恶即公利，人们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思考社会问题时，反而能得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罗尔斯在批判功利主义时，提出了另一套替代性方案：当人们给予一个社会或组织不同角色的成员的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针对某一个角色讨论应该如何对待他，由此避免立场先行。这便是《正义论》中著名的“无知之幕”。“无知之幕”概念提醒我们，社会公义，取决于人们能多大程度地跳出自身的立场与利益去看待问题。

在移民议题上，笔者无疑评判何种立场具有正当性与优先性，但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理解他人立场的移情能力(empathy)。或许，在社会价值多元的基础上，心平气和地追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应该成为一种讨论公共议题时不言自明的公义。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27日文章

好文回顾

【澎湃】陈祎：有关计划生育的五个“错误”认知

作者：陈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计划生育（网络图片）

我之所以想写这一题目，是因为回想起我在美国读博时的小故事。我博士期间的研究重点是家庭储蓄行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非常高，对此一个很流行的解释是一胎政策(One-Child Policy)。这一解释背后的逻辑非常直观，我国素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当这一手段被政策力量约束时（不能生足够的孩子），人们会诉诸其他代替手段（比如增加储蓄）。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证据是，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1978年之前其实长期只有5%的水平，在这之后才快速上升(Modigliani and Cao, 2004)，这也与1979年开始执行的一胎政策相吻合。我也曾长期持有的一种观点：一胎政策(1979年)是中国人口转型的始点。直到我的导师之一Adriana Lleras-Muney，给我看了下面这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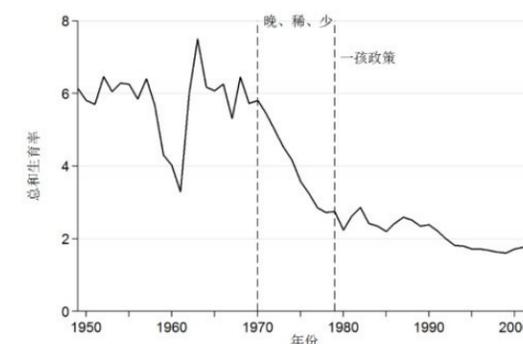


图1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历史变化（数据来源：路遇，翟振武，2019，《新中国人口六十年》）

问道：“你看！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原来不是1979年，而是1970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此时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非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甚至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一经验事实！毕业后，作为一名经济学博士，我开展了一系列和计划生育相关的研究，我逐渐意识到，对于“计划生育”这一耳熟能详的名词，大家对其认知可能并没有自己感觉那么准确，甚至在经济学研究中都存在颇多误解。因此，想借着这个机会，谈一下一个普通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对计划生育可能存在的几个“误解”。

错误认知一：“计划生育”等同于“一孩政策”

首先我先要明确一点，“一孩政策”是“计划生育”的子集。计划生育的英文是 Family Planning，也就是说，凡是对生育行为进行“规划”的政策，都可以纳入计划生育的范畴，包括70年代初的“晚、稀、少”政策（之后会谈）以及之后陆续放松的双独二胎、单独二胎、全面二胎政策。“计划生育=一孩政策”这一误解或许是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一孩政策确实是计划生育的主旋律，严格的政策执行加之大范围宣传，“一孩政策”这四个字很难不让人铭记于心。不光普通民众，学术界也倾向于将计划生育等同于一孩政策。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选取了相关领域两本权威刊物 Demography 和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以“中国+计划生育”为关键词，搜索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我们总共发现了14篇论文，其中12篇将计划生育等同于一孩政策，另外两篇提及了一孩政策之前中国也有其他的政策，但论文研究的重点依然是一孩政策。

“计划生育”等同于“一孩政策”这一误解本身看似只是咬文嚼字，但其可能带出另一个更大的误解：中国生育率在1979年有一个断崖式下降。图1已经说明了这是不对的。经济学的同行们不妨回想一下，自己身边有多少论文用1979年前后的一孩政策变化作为识别手段的？即使识别策略在计量上没有问题，那么1979年前后局部的变化也只是中国生育率转型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1979年之前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下一点要讨论的。

错误认知二：计划生育始于1979年

“计划生育”等同于“一孩政策”这一误解会很自然地导致另一个误解——中国的计划生育历史始于1979年。事实上，中央在1962年就发布了[62]698号文件《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4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由此可见，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计划生育的概念已经提出，但是因为之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真正有效力的计划生育始于七十年代初（但不是1979年！），1971年国务院发布了另一份在中国计划生育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71]51号文件），这标志着计划生育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事实上，部分省份（广东和山东）早在1969年和1970年就已经开始了试点。期间“晚、稀、少”的政策方针被逐步提出。“晚”指结婚晚（男性25岁，女性23岁）；“稀”指生育间隔长，一般两胎之间不短于三年；“少”指数量少，一对夫妻一般最多只能有两个小孩。值得一提的是，“晚、稀、少”在执行上是相对柔性的，并不像之后一胎政策那般严格。[1]

那么有没有证据指出我国实际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1970年，而不是1979年呢？从图1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认知：1969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5.7，到了1978年，生育率其实已经下降到了2.7。一孩政策执行的1979年之后，生育率的下降其实是相对平缓的。我的几篇论文（Chen and Huang, 2018; Chen and Fang, 2018）利用各省市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年份上的差异（从1969年到1975年），证明了在七十年代初期，一个省在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之后，该省的生育率会出现一个快速的下降。“领导小组”这个单词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其成立一般标志着政府开始重点关注某一个问题。以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李克强总理。七十年代初陆续成立的省级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组长也主要由省级党政领导一二把手担任，可见其重要性。图2对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成立进行了事件分析（event study），抛开技术细节，可以将其粗略地解读为在尽可能控制别的因素（经济变量、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及其趋势）之后，各省生育率在领导小组成立前后的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当且仅当领导小组成立后，生育率开始逐年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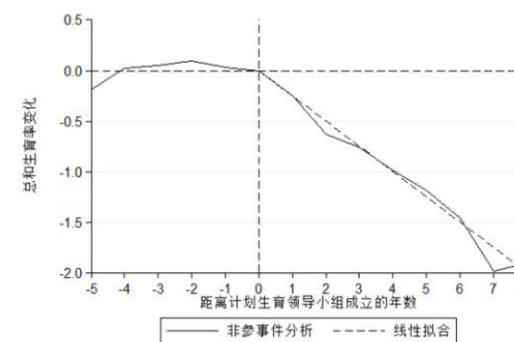


图2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的事件分析
(来源: Chen and Huang, 2018)

错误认知三：一孩政策是中国生育率下降最重要的原因

之前我提到了，有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不经意间将1979年作为中国生育率的分水岭，比如某篇最近发表在宏观领域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假设七十年代的生育率是4，到了1980年生育率突然降到1.6。那么事实确实如此吗？要是我们非得给中国生育率画一条“分水岭”的话，从图1可以看出，1970年才是更合适的年份。

其实在人口学领域，一孩政策对于生育率下降的有效性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尽管大众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孩政策是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罪魁祸首，但在人口学研究中，到底是经济社会因素还是政策因素是主因并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即使到了2018年，学术界对于一孩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独立学者 Daniel Goodkind 在2017年的 Demography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The Astonishing Population Averted by China’s Birth Restrictions: Estimates, Nightmares, and Reprogrammed Ambitions” (Goodkind, 2017) 的论文。简单来说，坊间经常引用的一种说法是认为一孩政策使我国少生了4亿的人口，但这一估计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Goodkind的论文对这一数字进行了估算，认为3.6亿到5.2亿是合理的区间。但 Demography 在2018年又发表了四篇针对该文的评论与回应（comment & reply），这是在很少见的情况，可见其争议之大，其中一篇评论的题目就针锋相对地取为“Socioeconomic Factors Have Been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of China’s Fertility Changes Since the Mid-1990s” (Zhao and Zhang, 2018)，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才是中国生育率长期下降的主要因素。

另外有一点值得一提，1979年之后的一孩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八十年代中期的“开小口堵大口”，允许部分满足条件的农村家庭生养第二胎（如：头胎是女孩）。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一孩政策在执行层面上有一次收紧（回到图1，可以看到1990年前后我国生育率也有一段明显的下降），地方官员个人需要对政策执行负责，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官员实行一票否决制，期间社会抚养费（也叫超生罚款）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Ebstein 2010; Huang et al., 2014)。

总而言之，我个人并不认可简单粗暴地将1979年作为分水岭，将生育行为进行简单的前后比较。不管在政策上还是数据上，这种做法都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

错误认知四：计划生育（及其带来的生育率快速下降）是中国特色

不少人在潜意识里会认为计划生育是我国特有的政策，其实计划生育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1974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了世界人口会议，当时就有包括美英在内的诸多西方国家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2]。早在1976年，就有40个国家（占当时世界人口的58%）提出了明确的旨在降低生育率的国家。到了2013年，有政府直接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更是增长到了160个 (de Silva and Tenreyro 2017)。但在政策执行力度上我国确实一直保持在世界第一 (Ross and Stover, 2001)。

此外，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也是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包括那么没有严格计划生育的国家。张俊森老师在2017年发表在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的一篇文章里提供了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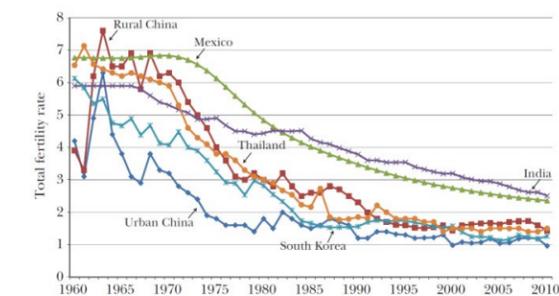


图3其他国家的生育率变化 (来源: Zhang, 2017)

如果我们只看上图的七八十年代，可以发现中国期间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显得那么“另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变化对于生育率的下降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错误认知五：放宽计划生育限制后，我国的生育率理应上升

2015年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结果估算，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惊人的1.05，即使考虑到可能的测量误差和低报漏报，我国的超低生育率已是不争的事实。2016年开放全面二孩后，累积效应经过2017年和2018年的集中释放后，2019年出生人口进一步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道[3]，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相比2018年下降58万，相较2017年更是减少了142万。因此，开放三胎甚至全面解禁计划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即使真的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我国的生育率就会随之上升么？我的判断是不会。

这里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如何正确理解计划生育的效果。我认为计划生育的效果主要取决于生育意愿（主要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和政策约束（主要由政策法规决定）的比较。在七八十年代，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还是比较高的（假设每家有意愿生3-4个小孩），但由于存在政策约束，每家最后只能生1-2个小孩，此时计划生育的政策效果是比较强的，并且实际约束真实生育率的是政策约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育儿成本的不断上升，人们的生育意愿一定会持续下降，但只要生育意愿依然高于政策约束，这种意愿的下降就无法立刻体现在生育率的下降上。但如果生育意愿降到政策约束以下，假设每家只想生1个小孩（甚至不生），那么此时政策其实是没有作用的！因为限制生育率的因素已经变成了生育意愿！我国在2013年底实行单独二胎和2016年初实行全面二胎后，生育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已不太具有实际的约束力。只有当有一定比例的夫妻愿意生三个或以上的孩子，当前的二胎政策才有实际约束力，大家结合自己的生活，不难想象这一比例的人群有多少。

综上所述，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光进一步放松政策约束是不够的，一定要想办法提高生育意愿。当然，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国家能提出切实有效的手段。但我认为有三个问题亟待弄清楚：

1. 不同人群的生育行为面临的“真实约束”是什么？不同人面对的约束是不同的，城镇青年可能是高昂的房价和孩子教育成本；农村进城务工青年可能是因为户籍问题，即使有了孩子也被迫需要和孩子长期分离。低收入人群面临的可能是金钱约束；高收入人群面临可能是时间和精力约束。要是我们把低生育率比喻成一种病，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疾病的症状和诱因，之后才可以对症下药。

2. 在了解生育的真实约束之后，就可以思考什么样的政策可以缓解这些约束？其实过去几年我国已经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比如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中包括了子女教育、房贷利息、租金等和年轻夫妻息息相关的项目（缓解金钱约束）；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填补我国幼儿3岁上幼儿园以前的看护空白（缓解时间和精力约束）。当然，目前这些政策或者力度尚小，或还处于建设过程中，其政策效果还有待未来的系统性研究。

3. 假设生育率确实难以提升，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还是以疾病为喻，对策其实分两种，一是治愈，二是在难以根治的前提下，让病人生活得更好。鉴于目前的国际经验，我认为我国需要做好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水平的准备。要是数量手段行不通（多生），就可以思考质量手段（优生），即提高已经出生的孩子的“质量”。我国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非常遗憾，一方面人们在担忧新生儿人口锐减，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缺乏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和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应该同低生育率一样引起政府的关注。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月27日文章

【光明网】刘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困境中的世界为中国提供了机遇吗？

作者：刘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车间生产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远洋贸易受阻

“尽管1913年的政治动荡（即二次革命——作者注）使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贸易停滞，1914年看起来前景可期，有证据表明商人开始对中央政府重拾信心。”——Returns of Trade（中国海关年报），1914年，第1页。

“大战开始之后，贸易一时间完全瘫痪了。”——Returns of Trade（中国海关年报），1914，第677页。

经过19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世界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紧密相连。各地的商船将美洲和亚洲的棉花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欧洲的工厂，再将欧洲生产的纱线、布匹和机器销往世界。彼时的中国，开埠超过半个世纪的主要口岸早已对挂着各国旗帜的商船司

空见惯，参与国际贸易也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进口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并出口茶叶、丝绸和大豆等农业产品。国际贸易带来的海关税稳定增长，成为贫弱中国当时向外借款的重要担保。

1914年6月24日，塞尔维亚青年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一战当然将以其席卷欧亚的规模和死伤惨重在战争史上留名，不过这两点很快就要被不久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超越。无法超越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全球化浪潮的影响：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降低关税、促进贸易的共识随着战争的打响，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作为战前主要工业品出口国，欧洲国家卷入战争使原本用于生产商品的资源转而制造军火，使战争期间世界市场商品供给，特别是工业品供给大幅减少。而更为

糟糕的是，战争使商船被征用，航路被破坏，带来远洋贸易成本的急剧增加：1915年2月，德国开始对英国周围的水域施行“无限制潜艇战”，不经警告即可打击协约国商船，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击沉船只的吨位数量达11.6万吨。据估计，从1914年到1918年，远洋贸易的实际成本提高了8倍。

不过于很多人而言，远洋贸易的暂时受阻或许也不是坏事。

开放还是封锁？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发展？

“先进工业国家进行完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一个在工业上落后的国家……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就决不能使自己的工业力量获得充分发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参与公共讨论遵循着一条潜规则：拥护贸易，但不过多纠缠于细节。”——Dani Rodrik，《贸易的真相》。

贸易政策如何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是经济学诞生伊始就关注的话题。《国富论》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扣针厂的生产。斯密发现，尽管一个人一天或许都不能生产一枚针，10个人通过分工一天可以生产48000枚针；但是48000枚针要通过市场才能变成财富，由此市场决定了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富论》诞生超过两个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自由贸易会让各国专注生产其技术或者资源禀赋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从而增加产量和产品种类，也有助于提升经济的整体福利。同时，开放贸易、降低壁垒将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引入竞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自由贸易的好处因为看上去过于理想，在实际执行时始终都有质疑的声音。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就指出：“那些充分利用全球化推动增长的国家其实会充分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以促进出口，并使用进口壁垒帮助本国高附加值产业的形成。”从政府的角度，对进口施加关税可以作为收入来源，也可以作为政策工具保护某些重点工业和生产者。由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率先提出并经过后世完善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就认为，某些工业的早期可能效率不高，要规模扩大之后才能提高效率并与其他国家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通过限制进口，在早期对这些工业予以暂时保护。

类似的，如果某些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工业，那么国家也有理由对这些有带动效果的工业予以暂时保护。

当代经济学家希望搜集实际证据考察贸易保护政策是否真的促进工业发展。由于战争常常成为打断贸易的意外因素，因为战争突然而至的贸易壁垒可以帮助考察关税是否能真的帮助本国工业的发展。达特茅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Douglas Irwin考察因拿破仑战争影响而于1807至1809年在美国实施的禁运法案。他发现封锁贸易帮助了美国的制造业发展，但同时带来了约占国民总收入5%的福利损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Réka Juhász的最新研究则考察拿破仑下令实施的大陆封锁对法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有何影响。她发现，1800年左右的法国企业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却始终未能发展起来。1806年施行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纺织品进口减少，为法国纺织业提供了难得的成长机会，这一影响的效果甚至持续至长期。

时针拨回20世纪初，一战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远洋贸易受阻和进口的工业品减少，是否也经历了工业的短期繁荣甚至长期发展呢？

中国棉纺织企业的沉浮岁月

“在天津，本土产品填补了进口的减少……困境中的世界为中国（工业）提供了机遇。”——中国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

“由欧战所激起的繁荣，转瞬即逝，接着便是极度的萧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虽然远在东方，中国强烈感受到了一战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从1914到1918年，进入中国的外国商船总吨数减少了1/3。由于棉纺织品在一战之前占中国总进口品的32%，棉纺织品的进口相应发生减少，影响了棉纺织品的市场价格。以棉纱为例，从1914年到1918年，中国的棉纱进口数量减少了57.9%，平均价格则变为原来进口价格的至少两倍。

高昂的市场价格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获利机会。一战之前，不少初设的中国棉纺织企业都在资金困境中挣扎，一战的中后期则成为这些企业的获利良机。在南通，曾经的状元张謇建立的大生纺织公司迎来了自1899年创立之后获利最多的一年，资本收益率从1916年的9.8%增长为1919年的108%；在上海，刚刚由1916年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近代车间复原图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立的申新一厂在短短三年里，资本收益率也翻了10倍。根据京都大学教授森时彦对当时23家中国棉纺织厂的统计，1919年，这些工厂的平均资本收益率都超过了100%。按照已故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严中平先生的总结，“地无分南北，厂无论大小，大都全能获得意外的厚利。”

与此对应的是新设企业的增加。从1919年到1925年，平均每年都有至少9个企业设立。根据棉纺织企业设立的情况和到口岸的交通成本可以看到，到口岸越容易的县相对会有更多纺织企业。由于中国的主要棉花产地在北部和中部，大多数工厂也出现在这些地区，比如平汉铁路在河北境内的部分就有不少新厂成立。据估计，1930年时中国本土的机械棉纱产量已经超出了消费量，甚至略有出口。

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本国企业并没有充分利用一战的短暂“保护”带来的好处——非不为，实不能。不少企业家发现，尽管棉纱进口减少让企业获得厚利，但是战争也同样阻碍了纺织机器的运输。英国是当时棉纺织机器最重要的生产国，并在一战之前提供了中国的大多数纺织机器。英国纺织机器的数据显示，一战期间收到的海外订单数和实际发出的机器数之间出现了十分明显的间隔，某些订单可能历经三四年才可送出，而在战争

结束之后只需要不到一年。民国政府对纺织业的调查也显示，尽管从1916到1919年对纱厂的平均投资有所增加，这些投资却没有转化为纱锭数目的增长。荣德生在日记中写道：“民国六年，申新一厂无法添锭，只物色到两部旧货。生意转佳，月月大赚，不肯抛售故也……民国七年，申一……欲添纱机，无买处……申二定到英机一万。先将老机拆散，坐守新机到达，大失机会。”

随着大量新企业在战后集中进入市场，1922年底市场很快由盛转衰，发生了“（原）棉贵（棉）纱贱”的现象。诸多新设企业甚至未及盈利即告倒闭。面对困境，棉纺织企业并没有束手就擒。1917年由各个华厂参与的华商纺织联合会成立，在行业困难时期曾经呼吁企业联手，不过收效甚微。在纺织企业的游说之下，1928年开始国民政府通过关税谈判对进口纺织品征收关税，几种典型布匹的关税从之前的5%上升至1928年的10%左右，1930年进一步提高至13%至24%，并于1934提高至26%至53%，以期能保护国内的棉纺织企业。不过，就在中国企业逐步开始生产行业相对低端的粗纱、低支纱、粗布的时候，日本从一战之后也增加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通过在中国设厂和吞并小厂，日厂逐步占领了高支数的棉纱市场。相对华厂，日厂有更优的经营管理水平 and 充足的资金支持。从1931年至1935年，因国内

战乱和美国《购银法案》的影响，纱价跌落，市场萧条和融资困境让中国纺织企业再度陷入困境。根据严中平的研究，从20年代中期开始，超过一半的棉纺织企业经历破产、兼并、或直接被银行接管，哪怕是一时风头无两的大生也未能幸免。

1936年的纺织企业逐步开始从逆境中复苏；可惜仅仅一年之后，抗战爆发。由于纺织企业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工业中心，在战争初期即告沦陷。来不及内迁的企业或被破坏，或被占领。抗战结束时已不复当日荣光。

一战的爆发给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按下的不是暂停，而是停止。战争期间，虽然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

抓住时机得到发展，但囿于资本和外部环境，可以说并不十分成功。一战的结束也并未带来全球化的恢复。以中国为例，新兴的工业企业试图在世界市场冲击中保护自己，使贸易保护成为当时的国家政策。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战后的利益分配不均和世界性萧条引来了对开放的不满和焦虑，极端国家主义落地生根，并在不久的将来把世界重新拖入战火。简单的全球化与简单的封锁都不能一劳永逸地保证经济的繁荣增长，为了让国内群体充分获得来自国际市场的好处，需要精巧的政策组合与制度设计。

本文首发在光明网以及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4日文章

谢佳欣：社交软件真的让你快乐吗？

作者：谢佳欣（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Time Spent on Social Media

Daily Time Spent on Social Media

Average h:mm spent engaging with/connected to social networks during a typical day



(图一来源: Latest 2019 Social Media User Trends Report - GlobalWebIndex)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软件正全方位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最初定位于打破距离限制，使用户与朋友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社交平台已经逐步取代门户网站，成为人们关注最新的时事新闻和娱乐八卦的重要渠道。近一两年来短视频制作的兴起更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社

交软件作为娱乐消遣的主要工具，搜寻趣味性内容，打发空闲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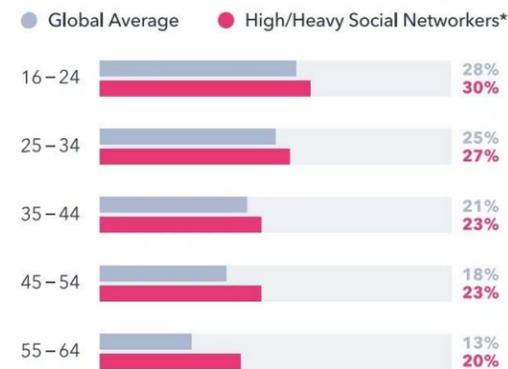
一项由英国市场研究公司 GlobalWebIndex 发布的社交媒体趋势报告 [1] 显示，在过去七年里，全球各地

区的数字用户花费在社交媒体和消息软件上的日均时长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图一）。涨幅最大（69%）的亚太地区，数字用户日均花费在社交软件上的由2012年的一小时二十四分钟上升到2019年的两小时二十二分钟。而涨幅最小（33%）的拉美地区的数字用户在2012年时，每天平均花费在社交软件上的时间就有两小时四十分，到2019年更是高达三个半小时。

与此同时，从图一中也可观察到这种增长在近一两年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与此趋势相对应的是，用户也更多的注意到自己在社交软件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并开始有意识的记录和量化自己的时间花费。特别是日均时长超过一小时的重度用户（如图二红色所示），他们使用屏幕时间跟踪功能的比例均高于同年龄段的其他用户。而纵向比较各年龄段的用户，16到24岁的年轻族群使用屏幕跟踪功能的比例最高，他们平均每天在社交软件上花费三小时，恰恰是日均时长最高的组别。当然，屏幕时间跟踪这一理念本就是经由社交媒体提出和传播的，所以重度用户自然会更有可能会接触到相关的宣传和推广。但正确估量社交软件对使用者的福利 (welfare) 影响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Screen Time Trac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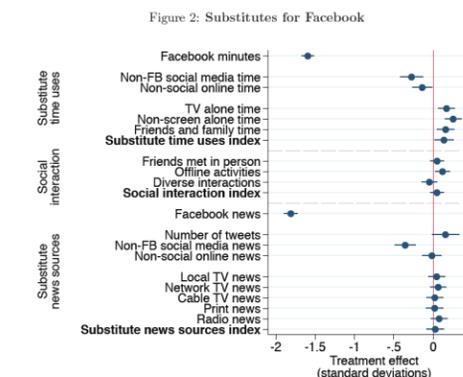
% who say they have used their mobile to track their screen time or set limits for certain apps



(图二来源: Latest 2019 Social Media User Trends Report - GlobalWebIndex)

在一篇即将刊登于美国经济学评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的文章中，作者 Allcott 等报告了他们进行的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停用 (deactivate) 脸书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的随机试验。具体来说，作者通过脸书广告招募了2743名用户，并事先预估了这些人对于在选举前四周暂停使用脸书的接受度

(willingness-to-accept, WTA)。然后研究者将WTA低于102美元的被试者随机配到实验组（即暂停使用脸书 [2] 组）和对照组（即不受到任何实验干预）。在随后的实验中，研究者一方面使用包括发送短信，问卷调查，邮件等方法来收集被试者主观提供的实验结果，另一方面也直接度量被试者在脸书和推特上的活动和是否参与投票等客观的行为变化。实验发现，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之前四周停用脸书的实验干预降低了用户的花费在网络上的总体时间，使得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独处或与家人朋友共度（图三）。



Notes: This figure presents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Facebook deactivation estimated using Equation (1). All variables are normalized so that the Control group online distribution has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one. Error bars reflect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s. See Section 2.3 for variable definitions. Facebook minutes is not included in the substitute time uses index, and Facebook news is not included in the substitute news sources index, so we visually separate these two variables from the other variables in their respective families. We also visually separate online and offline time uses and news sources, although all online and offline substitutes enter their respective index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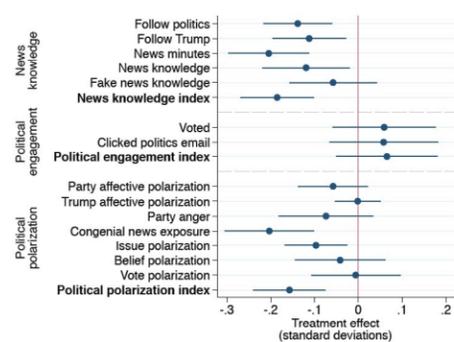
(图三来源: Allcott, Braghieri, Eichmeyer, 和 Gentzkow, 2019)

同时，停用脸书也自然降低了用户对新闻时事的所知和对政治的关注（实验组表示他们更少的关注政治新闻和总统了，也更难以对当期新闻事件的事实性问题给出正确答案），但同时停用脸书的实验干预在没有影响被试者政治参与行为的情况下，降低了他们的政治极化（图四）。极化被认为与近年来全球都在上升的仇恨言论、族群对立等趋势相关。作者采用了一系列测量政治极化的方法，但总体来说都试图描述人们对自我观念的（正面）反应和对不同立场和观点的（负面）反应之间的差距。停用脸书的干预使得研究者构造的政治极化指标下降了0.16个标准差。而此前的研究发现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在1996到2018期间上升了0.38个标准差 (Boxell 2018)。

唐立鑫等：最低工资上涨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了吗？

作者：唐立鑫（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Figure 3: Effects on New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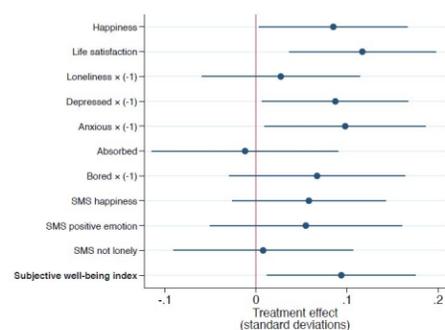


Notes: This figure presents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Facebook deactivation estimated using Equation (1). All variables are normalized so that the Control group endline distribution has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one. Error bars reflect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s. See Section 2.3 for variable definitions.

(图四来源: Allcott, Braghieri, Eichmeyer, 和 Gentzkow, 2019)

在经历了实验干预之后，不仅是被试者反馈的主观评价的福利提高了（图五），更重要的是停用脸书的被试者在试验结束之后也持续的降低了脸书的使用时长（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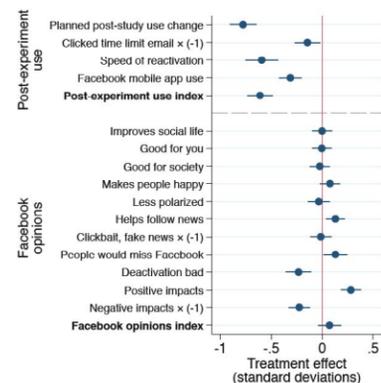
Figure 5: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Notes: This figure presents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Facebook deactivation estimated using Equation (1). All variables are normalized so that the Control group endline distribution has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one. Error bars reflect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s. See Section 2.3 for variable definitions.

(图五来源: Allcott, Braghieri, Eichmeyer, 和 Gentzkow, 2019)

Figure 6: Effects on Post-Experiment Facebook Use and Opinions



Notes: This figure presents 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of Facebook deactivation estimated using Equation (1). All variables are normalized so that the Control group endline distribution has a standard deviation of one. Error bars reflect 95 percent confidence intervals. See Section 2.3 for variable definitions.

(图六来源: Allcott, Braghieri, Eichmeyer, 和 Gentzkow, 2019)

实验结束后的四周里，实验组每天在脸书软件上花费的时间比控制组少 11 分钟，而此前的统计曾表明美国人平均每天在脸书上花费 58 分钟。他们也更愿意寻求对脸书使用频率进行自我控制的方法。这一系列结果表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快乐比他们以为的少。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准确的知道自己在各项活动中获得的福利，从而通过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和金钱来优化自己的总体福利。但是如果消费者高估了社交媒体带给自己的福利，那么传统的经济模型将会高估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gains）。另一项由心理学家 Sagioglu 和 Greitemeyer (2014) 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脸书的日均使用时长与负面情绪的产生具有相关性，而这种负面情绪主要源于感觉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却没有做成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但即使这样，当人们点开社交软件时还是（错误地）预测自己会从中获得一些快乐：当 Sagioglu 和 Greitemeyer 的被试者预测自己每天花 20 分钟上脸书会使得他们感觉更好时，事实上使他们感觉更糟了。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月26日文章



工资（网络图片）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非常迅速。2000 年，中国占世界 OFDI（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只占 9% 左右。到 2015 年，中国占世界 OFDI 存量的比重已经达到 21.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国，占到全球 FDI（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近 10%。中国的 OFDI 在短时期内井喷式的增长背后的导致原因是什么？笔者与复旦大学樊海潮，中国农业大学林发勤合作发表于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的论文“Minimum wage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a”，基于我国的微观企业数据对这一问题从最低工资角度进行了研究

我国早在 1993 年就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随着 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颁布，最低工资制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并强化实施。伴随着各省份至少每两年一次的调整，2001 至 2012 年间，全国的月平均最低工资已从 271 元上升至 717 元，涨幅为 165%。最低工资的增长增加了企业的劳工成本，可能导致企业走出

去。近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将生产线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类似事件常常见诸报端。福建省的福耀玻璃集团于 2016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莫瑞恩市开设了新工厂。福耀玻璃集团的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访问时坦言中国制造业的高成本困境，包括高税负、连年上涨的人工工资等是导致其在美国建厂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此外，我国最大的鞋类出口商之一浙江华建鞋业有限公司也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在埃塞尔比亚设厂。我们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

研究表明，最低工资的增长可以解释中国 OFDI 增长的 32.3%。

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揭示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导作用。这种诱导作用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对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诱导作用越大。同时对于（相对于出口所需的固定成本）

OFDI所需固定成本越小的企业诱导作用也会越大(水平FDI和出口之间的权衡)。文章在各地级市2000-2012年的最低工资数据、常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目录、地级市层面的其他宏观变量(如GDP、地级市层面的汇率冲击)等数据来源的基础上,在模型预测、内生性处理、异质性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

在有关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中,如何解决政策的内生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几种手段处理内生性的问题。首先,在基准回归的变量的基础上,文章控制了更多的地级市层面的宏观变量(如地级市层面的有效汇率)。文章发现这些宏观变量的添加对回归系数的数值及显著程度都没有明显影响。这些结果有效降低了研究者对遗漏变量问题的顾虑。其次,我们采用了Dube, Lester, Reich (2010)对美国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中提出的解决内生式问题的方法。参照Dube, Lester, Reich (2010),我们对跨越省界的相邻地级市(如广东的梅州和福建的龙岩)进行配对,从而构造了一个新的样本。这个样本的优势在于:1.处于不同省份的相邻地级市更有可能在未能观测到的维度上有相同特征。2.处于不同省份的相邻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是由不同省级政府所决定的,

更有可能是外生的。文章通过地级市配对乘以年份固定效应(city-pair-year fixed effects)以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最后,文章提出了一项安慰剂检验。文章发现,地级市的最低工资对于企业对避税天堂的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促进效果。

文章最后对最低工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探讨。文章发现,第一,最低工资对OFDI的影响最强的地区是东部省份;第二,主要影响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第三,对生产率高的企业和劳动份额更高的行业影响更强;第四,最低工资在2004年最低工资制度改革之前对OFDI的没有显著影响;第五,2008年的劳动法进一步增强了最低工资对OFDI的影响;第六,最低工资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影响更强;第七,主要影响在生产型的OFDI上,而对商务型的OFDI影响效果不明显。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月25日文章

杨尚铭：《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的解读

作者：杨尚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了题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文章,文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建设土地资源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在国土空间规划、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的前提下,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统筹负责。要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2020年3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在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

自主权。这实际上是习总书记区域经济布局思想的推进落实。

该决定主要有两点:

(1) 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2) 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关于永久基本农田的背景,有必要在此先解释一下。为保护耕地,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确定的15.46亿亩保护任务目标,我国在2017年实际划定保护面积15.50亿亩的永久基本农田。因为这些基本农田已经落实到具体位置,该划定给许多城市的发展规定了边界。

那么《决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第一条是下放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审批权至省级人民政府。由于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称,一般而言,对地方的具体情况,省级政府比中央政府掌握着更多的信息,这一条无疑是增加了省级政府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来审批农转建设用地的灵活性。由于客观上中国城市等级的存在,处于等级上游的省会城市会得到倾斜。这条改革实际上顺应了我国目前发展“大都市圈”的国策,鼓励了经济活动向各省的省会及开发区等经济中心集聚,有利于提升经济资源的空间分布效率。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二条则针对永久基本农田,且只在试点地区试行1年,试点地区包含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长三角的江苏、浙江、安徽和珠三角的广东。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分配存在搭配不当的情况。例如,经济活动高度集聚、对土地需求旺盛的沿海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倾斜,这造成了沿海城市土地的稀缺及部分内地城市土地利用的低效率。

该条决定,给予了直辖市、长三角及珠三角省政府将永久基本农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是顺应了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客观经济规律,给予这些

地区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有利于我国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联系近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可以看出第二条有哪些重大的意义:

(1) 沿海地区由于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房价也不断上升,从而用工成本也不断上升,这使企业的用地成本及用工成本都不断攀升。空间上经济活动有向内地城市及海外转移的趋势。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向内地城市转移,对我国来说尚是有得有失,而产业向海外的迁移,却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消息。目前我国的产业升级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尚需要不少的时间。产业升级的城市,例如广东省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当然需要继续推进。但其他地级市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进一步放开土地资源的制约,能保持这些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为产业升级的城市提供宝贵的缓冲时间。

(2)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意义重大。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了,区域内部城市的交通设施互联互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关重要。该条决定,使省级政府拥有了依据情况快速有效地规划省内交通设施(如高铁)的权限,进而能促进我国区域内交通设施的快速发展,推进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当然,上述改革有基本前提:严格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有网友认为在地方财政吃紧的情况下,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地可以卖,是否会房价大跌?笔者认为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权限下放地区为经济发达地区,财政状况并不是特别严峻;二是即使有土地可供招标的情况下,依据经济学常识,对于政府来说,增加财政收入的理性行为并不一定是增加土地供应,尚有价格效应需要考虑;三是国务院将建立健全省级人民政府用地审批工作评价机制,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对试点省份进行动态调整。换言之,那些突破上述前提的省份将会丧失试点资格。

我国的改革基本上遵循了渐进的路子,一般是在若干地区先行先试,如果效果不好则总体情况仍然可控,若发现了好的经验则会迅速向全国推广。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也不例外。上述《决定》,是土地管理制度迈开的不小一步。

本文首发在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3月19日文章

数据调查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西南财经大学王军辉： 激励相容的反贫困政策实验

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与研究中心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AND RESEARCH CENTER

宣传动员

入户宣传



动员大会



宣传海报



田野实验开展过程（图片来自讲座课件）

疫情当先，我们缓下了回校的脚步。但是蜗居在家也不能阻挡我们热爱学习！

3月23日下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顺利举办了本学期第一期“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主题讲座。这也是调查中心首次举办线上讲座，活动得到了暨大师生的热切响应。

本期讲座主题是“激励相容的反贫困政策实验”，主讲人王军辉是西南财经大学反贫困政策实验室副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反贫困田野实验项目“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和“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的设计、实施和推广工作。

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与研究中心

目录 Contents

激励相容的反贫困政策实验背景

劳动收入奖励计划

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

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

讲座主要内容（图片来自讲座课件）

讲座伊始，王军辉首先通过精准脱贫热点话题作引入，阐述了反贫困政策实验的背景，而后结合自己在四川大凉山、四川藏区、乐山等地调研经历，分享两项反贫困政策实验项目中的案例情况和部分实验结果。从实验来看，外部经济激励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家庭增加劳动投入和教育投入，进而增加收入，有利于贫困家庭的脱贫和发展。

讲座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与会师生认真听取实验内容并积极提问，与主讲人一起讨论实验的设计细节、执行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互动活跃。

“（这个讲座）一方面让我们了解到贫困家庭的教育环境、饮食常态等社会民情，另一方面学习到了现金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知识，有点深但是感觉很有干货！”

“以前学生和老师之间都是隔着三尺讲台的，现在不用举手就可以问问题，还可以直接截屏 PPT，感觉挺好的。”

“之前来听海外企业调查那期讲座都抢不到座位，这次不用抢座位我就带着同学一起来听一下，挺方便的……”

讲座后学生纷纷感谢王军辉老师的分享，表示这次讲座形式便利，内容有“干货”，并期待下一期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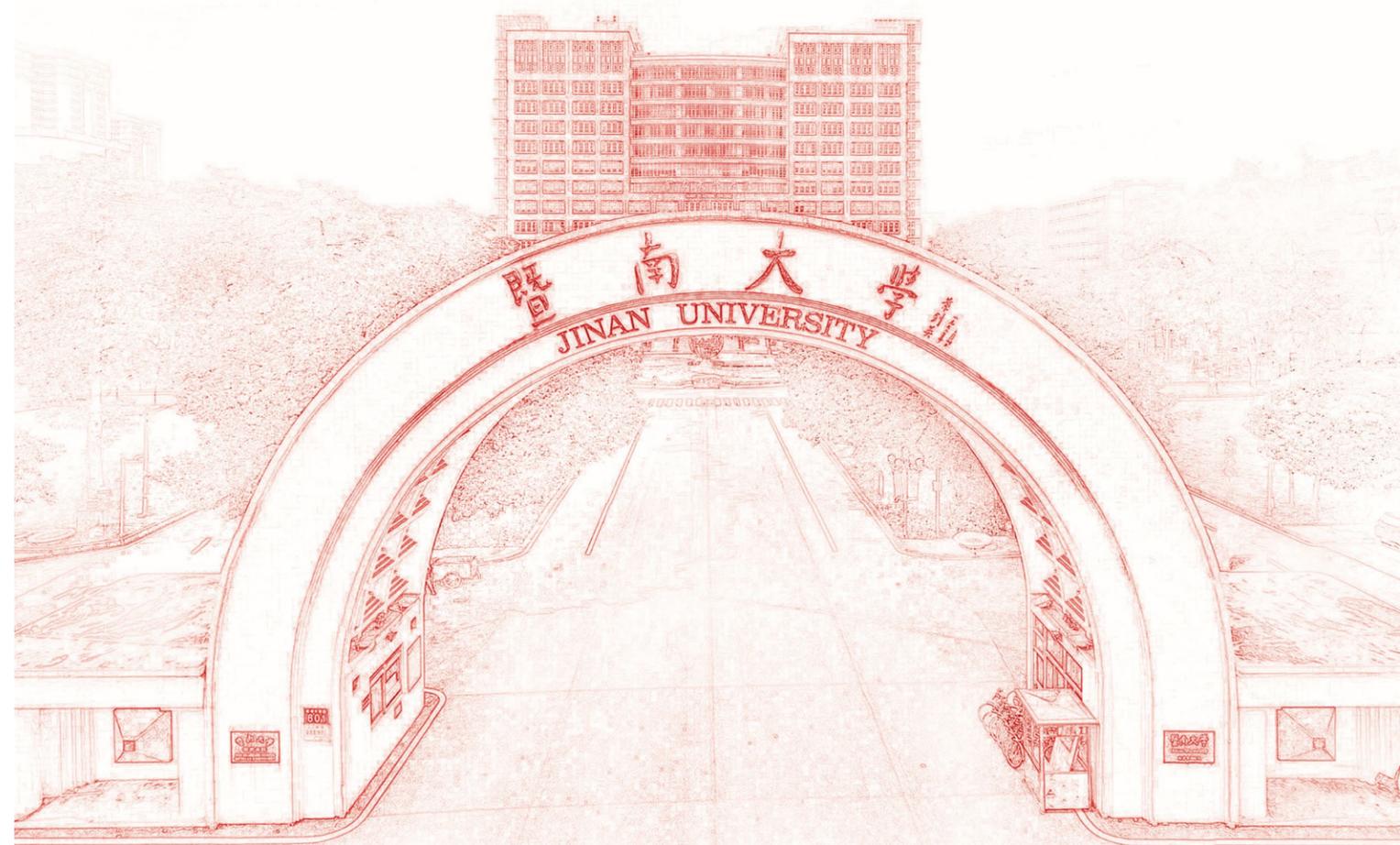
之后，调查中心将继续邀请调查大拿，努力打造优质“云讲座”，让更多对调查有兴趣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线上课堂，让大家可以足不出户涨知识。



参与讲座的部分师生（图片来自讲座直播截屏）

人物专访

IESR人物



IESR 人物

助理教授 Jun Hyung Kim: 走在人力资本研究领域前沿的探索者



人物名片

Jun Hyung Kim, 2019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同年加入 IESR 这个大家庭, 并担任助理教授一职。

Jun Hyung Kim 师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 在人力资本与儿童发展的前沿问题上开展了不少研究。他为何对人力资本问题情有独钟? 与 Heckman 教授之间又有哪些趣事? 为什么选择来到 IESR 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Jun Hyung Kim 对笔者娓娓道来。

01 “人力资本很有趣”

“对于我而言, 人力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这是 Jun Hyung Kim 在人力资本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感受。

钟情于人力资本研究的他告诉笔者, 作为在长期中改善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力资本其实包含的内容很多。目前关于儿童人力资本的研究处于该领域研究

的前沿, 他认为未来在儿童人力资本领域将会出现更多十分有意义的研究。

Jun Hyung Kim 已经发表的一篇文章是通过随机试验来研究对家长的外部干预如何改善他们的养育行为及其对孩子行为的长期影响。儿童时期的人力资本将对人往后一生产生显著且深远的作用, 进而对社会整体有所影响。在 Jun Hyung Kim 读博时, 学界对幼儿人力资本的本质已经有了一些认知, 即人力资本是多维度的, 并与人的行为和性格有关。并且人力资本具有动态互补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会为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带来乘数效应。但当时的学术界对亲缘投资 (Parental Investment) 的本质及不同类型的家长行为仍认识尚浅, 比如, “是什么决定了家长的行为, 家长的行为又有哪些不同类型” 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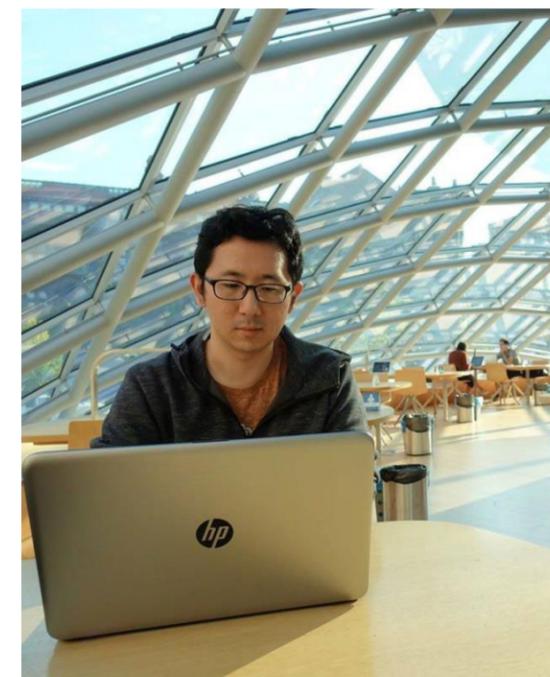
Jun Hyung Kim与Heckm教授、冯帅章院长深入讨论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追踪调查项目

彼时只是在读博士生的他, 怀揣着对儿童人力资本浓厚的兴趣, 开始尝试通过相关研究解答以上问题。一次偶然的的机会, 他受邀前往德国布伦瑞克大学交流学习, 德国布伦瑞克大学心理学系的学者们在了解到他的想法后, 慷慨地向 Jun Hyung Kim 提供了他们在儿童福利方面的相关研究数据, 而这些有趣的数据最终促成了这项跨学科研究的诞生。结合实证发现与理论模型, Jun Hyung Kim 在论文中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家长选择了某些看似对儿童未来有消极影响的抚育行为。这项研究也成为了他多项关于儿童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个起点。

02 “check your ego at the door”

谈到师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 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博士生涯时, Jun Hyung Kim 表示这是一段难忘时光。

初次和 Heckman 教授见面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Jun Hyung Kim 笑着说他是穿过铺满雪的路从家去办公室赴约的。Heckman 教授的办公室到处堆着书和论文, 他走进办公室时注意到墙上的海报写着 “check your ego at the door”, 他一直铭记于心、付诸于行。那场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Heckman 教授对他的想法颇有兴趣。



Jun Hyung Kim于芝加哥大学

和导师 Heckman 教授相处的这些年里, Jun Hyung Kim 最深刻的感受便是 Heckman 教授对学术本

身的尊重与一丝不苟的态度。Heckman 教授会仔细思考每一个想法,从最简单的结构开始仔细发展这个点,最终得出结论。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也对 Jun Hyung Kim 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开展实证研究时他也着重强调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03 与IESR从相识到相惜

Jun Hyung Kim 和 IESR 的缘分道不尽诉不完。由于导师 Heckman 教授与 IESR 联系紧密, Jun Hyung Kim 很早就知道了 IESR 的存在,并对这里的学者、学术氛围及丰富的研究机会印象深刻。

他回忆道,在参加完 2019 年美国经济学年会后,他特意从芝加哥飞来广州,在 IESR seminar 上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并得到了富有建设意义的评论。Jun Hyung Kim 坦言,比起芝加哥的寒冷天气,他更喜欢四季如春的广州,这里的美食也十分吸引他。那次拜访后,他惊叹于 IESR 为年轻学者们提供的广泛支持,并决定在此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到现在,Jun Hyung Kim 已经在 IESR 工作了几个月。他表示,他的感受和初次拜访时并无大异,并非常享受目前所处的环境。在“恶补”中文的他笑着说道,要把中文学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同事们都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日常生活也都能依靠手机等移动设备解决,因此没有什么障碍。

04 教学科研的“小目标”

谈及未来 2 到 3 年的规划,Jun Hyung Kim 在教学和研究两方面都有自己的目标。Jun Hyung Kim 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时就有给本科生上课的经历,他期待能在下学期或是下学年开始教课,和 IESR 的学生有进一步的交流,并尽心竭力的帮助他们。

Jun Hyung Kim 在学术科研方面的规划则更为具体。他表示会继续完善目前所做的家长行为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将有一系列的论文等待着投递和发表。具体而言,有一篇侧重家长抚育模式的理论文章待发表;同时,他也和 IESR 其他学者及 Heckman 教授合作了一项更偏实证的研究。利用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的数据,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趣的发

现。此外,他也期待对已有成果进一步拓展,在抚养模式、儿童发展及劳动力市场供给等方向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几个月里,Jun Hyung Kim 已经接触了不少 IESR 的学生。他的几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助研都勤奋努力又满怀对学术的热情。在访谈的最后,Jun Hyung Kim 真诚地表达了他对在读本科生和硕士生的一些建议,并结合自身申博的经历向笔者解释了其重要性。他说道,IESR 的培养模式是国际化的,将来学生们应该走向世界舞台。因此,他希望学生不仅要学好英语,还应珍惜 IESR 的资源,积极参加 IESR 所提供的和北美高校相同的 office hour,主动地和老师交流学习。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时,几乎每周都会去 office hour,和教授建立起了很好的关系。他不仅从交流中加深了对经济学的理解,也给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在申请博士时教授们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Jun Hyung Kim 鼓励 IESR 的本科生们多与老师们交流,为自己创造更为丰富的机会,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可能。

访谈中,Jun Hyung Kim 始终保持灿烂的微笑,他的平易近人、亲切和蔼让人如沐春风;当他叙述研究生涯、工作经历时,他所展现出对学术的热爱与专注使人连连叹服。在儿童人力资本的漫漫探索之路中,Jun Hyung Kim 还需要越过多座大山,跨过多重难关,相信他对学术的热爱以及严谨务实的科研精神将会成为他在此领域取得突破性科研成就的重要基石。在此,让我们共同祝愿 Jun Hyung Kim “研”途坦荡,捷报频传。

IESR 人物

助理教授陈思宇：用匠心浇灌自己的每一篇科研成果



人物名片

陈思宇, IESR 助理教授, 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已有研究成果发表于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国内外知名期刊。

01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有世界大局观

政策制定者常常面临着“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的两难选择。与污染企业产生的 GDP 相比,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一般是隐形成本, 难以被量化纳入政府决策的信息集。因此, 在一些国家,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政府采取的污染控制措施还远不够强硬有力。这时就需要经济学学者的研究去揭示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隐形成本。IESR 的助理教授陈思宇就是其中一位研究者。

她的第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是“Air Pollution, Student Health, and School Absences: Evidence from China”, 发表在环境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上。她在论文中探讨了空气污染所造成的间接社会成本。“我的这篇论文主要研究空气污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如

果学生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而生病, 由此经常缺勤, 那么他们的学习成绩势必会受到负面影响, 从而影响到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未来劳动收入。一般而言, 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较好, 而发展中国家的空气污染相对严重。如果空气污染造成劳动力收入降低, 这将进一步拉大全球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去做这篇文章的。”陈思宇介绍道。



陈思宇参加我院主办的第13次“中国劳动经济学者论坛”季会



陈思宇在中山大学校园

她以广州市 3000 多所学校的学生疾病和缺课情况为例，发现空气污染通过影响学生健康降低了学生的出勤率，产生了额外的经济损失。空气污染指数（AQI）每上升 10 个单位，全国平均每日增加 87.57 万缺勤学生；基于 2015 年的统计数据估计，中国政府每日对每个学生的教育补贴约为 100 元人民币（15 美元），如果学生缺勤，则相当于政府对学生的教育补贴没有落到实处，由此将产生可观的每日成本约为 131 万美元，这是空气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空气污染水平低于政府官方空气质量指导标准，其对学生的疾病发生率及缺勤率的负面影响仍不可忽视，说明国家目前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还不足以保护学生的健康。

陈思宇近期在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则关注空气污染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可能诱发人们的暴力倾向和愤怒的情绪，进而增加了社会总犯罪数量。此研究从社会稳定方面再次证明了空气污染存在隐形成本。陈思宇说：“这些研究旨在衡量空气污染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希望公众和政府部门在做决策时不仅关注到环境污染的直接经济成本，还应该考虑到其产生的间接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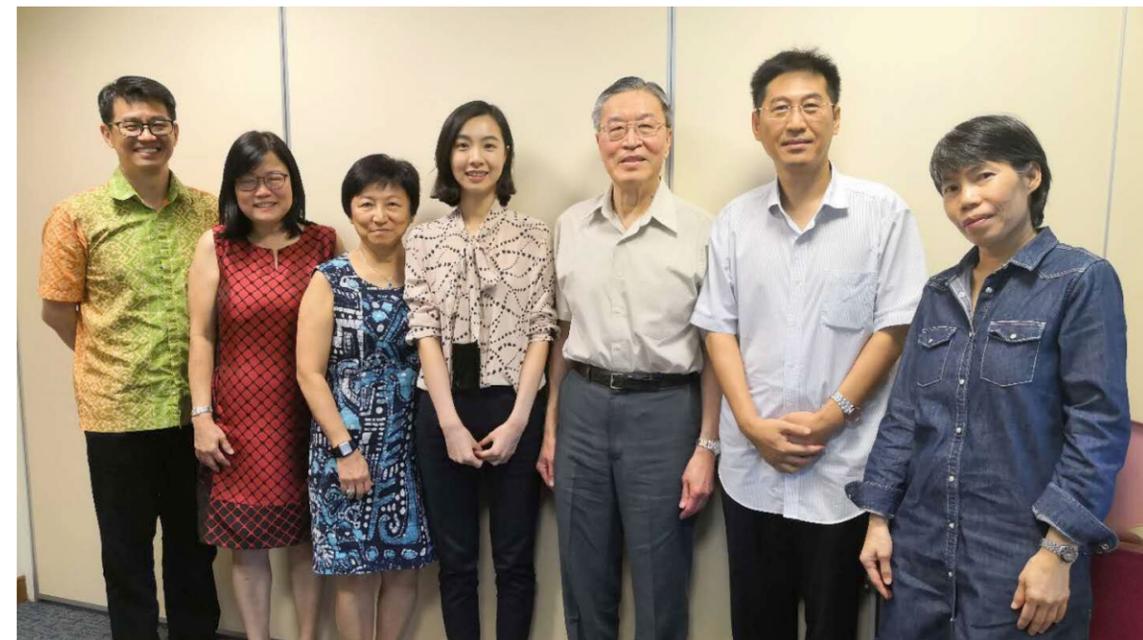
肺炎疫情中，在家办公的陈思宇虽然未受到严重影响，但也感触颇深，她说接下来有更强的动力做更多的研究来探讨气候变化给我们的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并

计划将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传播给大众，让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并不遥远而宏大，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陈思宇说：“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拥有世界大局观，从身边做起。环保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抽象且短期不容易看到收益的事情。作为经济学学者研究环境相关问题，将环保换算成真金白银的经济收益，则会让大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人们行动上也会循序渐进地改变，就像微小的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形成飓风，让整个社会焕然一新。

02 没有体验过科研过程的本科生活是不完整的

陈思宇大学本科时读的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却申请了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环境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在她看来，经济学不仅是一个学科的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上的训练和提升，学习一套分析问题的工具、方法和价值观。掌握了这套工具，可以分析很多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她强调道，“最终你还是要沉淀到一个领域。不同领域里面思考方式仍有差别，需要你深入，才能将问题从表面研究到本质。”

对陈思宇来说，做学术没有最痛苦也没有最快乐的时刻，而是一个苦乐交织的过程。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



2018年4月，陈思宇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KR Chou Scholarship

题时，天边飘来一片乌云，此时会纠结痛苦一会儿。但一旦找到了解决办法，疑云四散，产生一种明亮的快乐。遇到的问题越痛苦，找到解决方法时就越快乐。

例如，在做空气污染与学生缺勤率的那篇文章时，陈思宇就遇到不少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数据困难，由于论文中使用的广州市学生数据不是公开数据，因此陈思宇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和广州市疾控中心洽谈数据合作，逐步建立信任最后才拿到数据。第二个困难是随着文献的进步原本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在审稿时已过时。“当时写这篇文章，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处理内生性。本来以为使用日度数据和高维固定效应就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内生性问题了，但随着我的投稿，发现大家对内生性的识别越来越关注，原本的高维固定效应模型不足以说服审稿人，所以又重新收集了逆温数据，用工具变量法把结果全部重新做了一遍。”

经过两年半的精雕细琢，从最初立项到最后发表，陈思宇第一次独立走完了整套严格的科研流程。她分享自己对学术生活的体会：“学术研究已经抚平了我的情绪了，做学术的人一般不会大悲大喜，整体上我们的抗压能力和心态调节能力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没有体验过学术训练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陈思宇笑着说。“对本科生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科研成果，而是参与过程。其实大部份人将来不会做学术，但他学习到的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方式以及迎难而上的品质，正是在科研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的锻炼。”

当前做科研的难度似乎被妖魔化了，说得越高深反而容易让学生裹足不前。刚成为 IESR 助理教授的她觉得在培养学生科研兴趣时首要任务就是把科研变得“可完成化”。目前她带了两个大二本科生，这个寒假安排他们学习基础的计量软件。陈思宇介绍她带学生的方法：“作为老师，我们已经清楚一个科研项目是如何运作的，但是对学生则不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将科研项目分解，变成一个个具体的步骤，让学生先去执行。执行任务后再给他们纠错，这个纠错不是仅仅指出哪里做错了，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应该如何思考，培养他们主动探索的能力。期间，还需要告诉他们规范。当一个项目完成后，他们会产生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就会激发他们的科研兴趣。”

03 我在学术上努力的目标 是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

性别刻板印象也是陈思宇的研究方向之一。她提到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尽管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逐年提高，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然较低，在许多发达国家甚至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其次，在政治、商业等领域，女性居高位的比例仍然较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最终她们却没有参与社会劳动生产呢？究竟是女性在就业市场遭受了歧视；还是由于女性的偏好选择，她们的效用函数中家庭因素占比较高，所以她们愿意主动减少工作时间，放弃晋升？这也是陈思宇目前一篇工作论文的研究主题。

当提问到女性是否适合读博士，是否适合做研究，她是这样回答的。她认为这不是一个性别问题。女生考虑读博士，首先不要去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与性别没太大的关系，做研究最重要的品质是努力和坚持，只要做到这两点就一定能够达到一个还不错的水平。她举例有许多杰出的女性学者，让她敬佩不已。她的导师 Jessica Pan，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性经济学家。还记得她第一次与导师见面时，Jessica Pan 说道：“不要希望我安排任务给你，你要学会自己找想法，否则你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陈思宇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也是受到她所欣赏的、目前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女性学者 Janet Currie 的一篇论文所启发的。这些杰出的女性学者证明了女性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极高的学术成就，这也激励着陈思宇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奋进。

“在学术道路上，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足够专注与耐心，不断学习，深入沉淀，最终能够成为一个领域中的专家，用科学的观点帮助周围的人。”陈思宇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更应该沉下去，扎扎实实，用匠心去浇灌每一个研究项目，多想多学如何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04 IESR给经济学科领域 带来一股新鲜活跃的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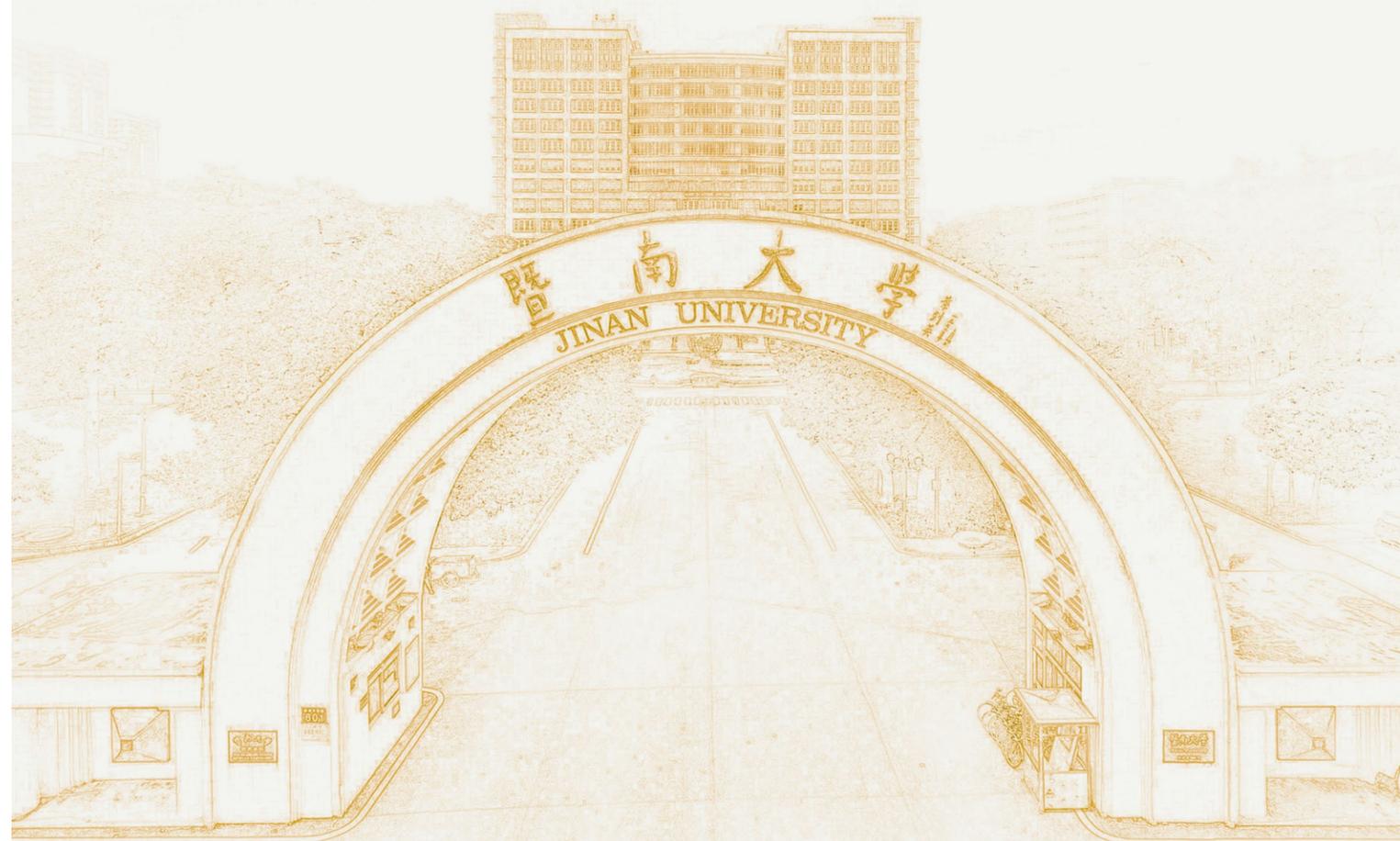
博士毕业后，陈思宇加入了 IESR。谈及这次选择时，她说 IESR 是国内经济学科与国际化接轨的改革先锋，虽然 2015 年才成立，很年轻，但是它做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同行内也是有口皆碑的。IESR 的发展和壮大，挑战着国内高校经济学科建设的传统模式，带来一股新鲜活跃的空气。

陈思宇回想了自己加入 IESR 半年来发生的两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一件事是 2019 年 9 月份的第一次参加全院大会时，冯帅章院长说：“学院尽量为年轻老师创造宽松活跃的科研条件，我们努力兑现当初招聘你们过来时做出的承诺”。这句话让她很感动。学院理解并解决了“青椒”们的心中所忧，这个学院是充满温情的；同时学院鼓励并且创造了能让高质量科研成果产生的条件，这个学院是充满前瞻性的。

另一件事是 2019 年 12 月份学院举办四周年院庆，学院认真表彰了每一个为 IESR 奋斗的成员。站在台上领奖的同事们有的腼腆羞涩，有的从容不迫，虽形色各异但都呈现一种笃定的底色、朝气蓬勃、无比开心，想必是对 IESR 的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干劲。陈思宇说：“从那一刻，我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非常自豪能成为 IESR 的一份子，并为之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生天地

抗疫，IESR 师生在行动



抗疫，IESR 师生在行动



教学“疫”线的师路心语：从线下到线上，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疫情期间，在“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呼吁下，全国上下都掀起了一股“网课”热潮。线上授课，让老师们纷纷变身“主播”，体验了一把当“网红”的乐趣。至今，我院开展线上教学已近一个月，各项教学工作已从紧急应对阶段转为常态运行阶段，授课老师也从“十八线”的新手“主播”修炼成教学届的“李佳琦”。接下来，小编将陆续连线我院教学一线的“主播”老师们，一起倾听他们在线上教学的“取经”之路，看看他们在保障线上授课教学质量和效果上有哪些小妙招吧~

IESR 助理教授刘诗濛：“线上教学让我更加热爱我的职业”

授课课程：经济研究方法与写作

受疫情影响，授课老师们都走下平日的讲台，开启了新的授课之旅。刚接触直播软件的时候，和大家一样觉得很习惯，但是学校的网络中心安排了很好的网上教学的指导课程，院里也组织了一个经验分享交流群，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小技巧。线上授课，会对授课老师的备课方式和课堂互动模式带来新的挑战，如何让同学们在电脑前也能真正参与进来，集中身心学习，积极参与互动，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也成为了老师们深思的问题。我的做法是建立课程微信群，方便同学们课后的交流讨论。同学们也十分积极，经常在微信群提问。另外，我也通过课后作业，课上提问的方式，提醒同学们在课前课后自主学习。虽然线上授课给我们带来很多挑战，但是我也从中收获了不少感动与惊喜。平常上课大家都比较拘谨，但是每到下课的时候，同学们都会在聊天框打字说老师再见，老师辛苦了之类的话语。我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线上授课会是一种越来越被人接受的授课方式。当然，线下教学的效果肯定更好。但是当有客观条件限制时，网课是一种很好的替代方式，并且网课能实现课堂的无边界化，使更多的同学在不同的地理位置都能参与进来。2020年是波澜起伏的一年，每天都在亲身见证并经历很多大事件，更让我体会到每天都值得珍

惜。上网课期间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让我更加热爱这样传递知识、互相学习交流的过程。疫情当前，大家能坚持学习工作，都辛苦了。大家一起加油，满怀希望，度过难关，明天会更好！

学生点评

刘老师的课把远在云端的论文写作拽到了我们的书桌上，掰开了揉碎了地告诉我们如何一步一步地进行论文写作，有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你们不要妄想仅靠这学期的一门课就能学会写论文，要不然不得气死读博士的人了。”这一句话瞬间减少了我的焦虑感，也对这门课和经济学论文写作有了更多的兴趣。为了帮助我们梳理近几次课的重点内容，每次课上都有 quiz，quiz 的最后一道“题”是请同学们提出对这门课的建议或想法，并且下次一上课就会谈一下这些想法并给出解决方案。除了课上讲授，刘老师还鼓励我们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多钻研，并在每次课上安排一名同学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分享自己精读的论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在准备和反思的过程中，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有进步，非常感谢刘老师能给我们这么多锻炼的机会。

——2017级本科生武文杰

刘老师是很严谨负责的人，网课的一大问题是师生互动困难，为此刘老师会在网课试课时照顾到每位同学，了解大家当前的学习研究状况，会提前发课件和课后阅读材料方便我们自主学习，还会在课上多次询问大家的反馈，收集评价与建议，并统一回答大家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回答和改进。这门课的意义不仅在于教给我们“鱼”，更教会我们“渔”，因此会有一节课由同学报告，刘老师会在同学作报告时仔细倾听，及时指出问题并耐心点评。

——2019级硕士生赵晓洁

IESR 助理教授宋彦：用心“打磨”好每一堂课

授课课程：宏观经济学

“上网课”，这是疫情期间能够有效开展教学工作的新方法。因为之前有使用直播软件办公的经历，所以对于它的操作模式还是相对熟悉的。但是当一名好的“主播”老师，还是很不容易的，线上授课有别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授课老师没有办法很直观地知道学生对课程的接受程度，难以得到他们的反馈。因此在这种教学方式下，我会花更长的时间进行备课，把课程内容讲解得更详细一点，更清楚一点，以此确保课程质量。其次，在课堂上，我会采取提问的方式，因为直播平台可以聊天，在进行提问后，学生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回答，在这过程中我会观察每一个学生的反馈情况，对一些相对“安静”的学生进行点名提问，了解他们的学习状态。当然，问题的设计也很重要，有时候为了激发大家的兴趣，我会提出一些之前没有讲过的内容，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跟大家的答案预期不太一样的题目，比如智力挑战一类的题目。最后就是重视课后辅导工作，利用好社交网络平台，多和学生交流课程内容以及解答他们作业中的问题。每一堂课都是经过老师们的精心打磨而来，因此，希望同学们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好好学习课程内容。疫情期间，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学生点评

宋彦老师给人的印象是严谨、体贴、接地气的，宏观经济学是一门距离我们日常生活相对遥远的课程，如果按照课本上的内容一板一眼地讲解难免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晦涩难懂，但是宋老师用切合实际的例子，将宏观经济学的某些知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不仅使它们更加通俗易懂，也让同学们都更加有参与感。其次，宋老师在平时的日常教学中加入了经济学相关的研究阅读部分，也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到宏观经济学对于当前世界的影响。在课堂氛围方面，宋彦老师与学生的互动非常热情且积极，我们对于问题的看法几乎能瞬间收获反馈，课堂变成了大家畅所欲言的空间而不是一言堂、单口相声。在课间的休息时间也不时能听到宋老师的平日笑谈，这些都给线上教学平添了许多趣味。

——2019级本科生邱俊杰

在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线上学习中，我十分喜欢宋彦老师的教学风格。线上的教学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影响，与线下教学并没有特别多的区别。他总会对一些较难的知识点进行一些引导性的教学，让我们自己独立思考，给我们时间进行讨论。在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中，更多时候需要我们去学习如何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宋彦老师在课堂上也给我们创造了很多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对宏观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体会。此外，宋彦老师还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学习他的课程是每周非常愉快轻松的事情。

——2019级本科生吴日源

IESR 助理教授李润梁：“同学们的配合是我最大的动力”

授课课程：金融经济学

线上教学是对传统教学的补充，未来二者将互相借鉴、促进。当然，它也有利有弊。好的方面就是，老师利用一台带录屏软件的电脑加一副耳机麦克风就可以实现录播了，学生也可以把网课视频保存下来，后期反复观看利于复习。但它对于授课老师而言会存在不少的挑战，对课件制作、教案编写以及了解学生个性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教学质量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除了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课（为保证效果，选择在周末上午去办公室录音）以外，我会通过布置作业（本学期作业频率会高于上学期），以及与自己指导的本科生进行交流从而得到他们的课堂反馈。另外，我也会把课程视频上传到百度云盘并分享到学生微信交流群，以便同学们复习。不过，同学们都很认真配合，按时上课，课堂纪律也比较好，作业也完成得比较认真，所以也减轻了我的“顾虑”。疫情居家期间，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提升的机会，教师们可以多关注新闻，领会方针政策，了解国家是如何从经济和金融领域应对疫情的，作为未来研究和建言献策的基础。对于毕业班的同学，在论文写作时建议大家可以对业内认可的优秀论文反复阅读并吸收。最后，感谢同学们的配合和同事们的支持。在家学习是对同学们来说是修身养性的好机会，也可以学习如何做家务，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学生点评

李润梁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温文尔雅，严谨踏实。本学期李老师讲授金融经济学，他介绍了金融市场、股票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经常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讲解细致入微。李老师还勉励我们对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深入研究，为将来在业界的发展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李老师在课前几天就把当周的课程视频分享给我们，他仍坚持在周四早上八点提醒我们准时上课，李老师的勤勉态度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李老师还布置了有意思的实践类作业，并能及时给我们作业的反馈。李老师敬业、勤勉，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

——2017级本科生陈洁桦

李润梁老师作为我们本学期金融经济学课程的讲师，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十分令我们感动而敬佩。金融系统是复杂的，因此要想学好金融经济学这门课程，对金融系统及体系的基础知识的了解与掌握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便于我们学习记忆并日后复习，老师不辞辛苦地将每次课程拍成长达2小时的视频，以供大家学习，同时老师会在微信课程群里实时回答同学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导致知识点的记忆与理解十分不易，课程中老师也对教程进行了归类与提炼，引用现实事例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复杂抽象的逻辑概念，更加精细与系统地诠释知识点；疫情之下，老师的敬业与认真激励并督促着我们努力学习！

——2017级本科生张子罕

IESR助理教授严子中：“线上授课让我收到更多学生的反馈和问题”

授课课程：计算机编程

“上网课”给我的感觉很新颖。刚开始接触直播软件的时候，学校和学院都提供了比较多的学习资源，因此对于软件操作我们也比较好上手。这段时间的网课教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方面，对主观能动性强的同学来说，网络授课无疑节省了他们的精力，云端授课时以及课后，网络语音或文字答疑也增加了同学和老师及时沟通的渠道和便捷性。比如，很多平时内向的学生在微信上会及时和我对话，我能更多更及时地收到学生的反馈和问题。另一方面，云端教学时，老师会担心对

学习自觉性较差的学生很难做到及时察觉和督促。对此，我目前感觉有效的方法是通过考核手段，以回家作业形式确保学生跟上进度。

本来我们计划在2月底举行一个关于经济学数量分析论文写作的公开讲座，但由于疫情耽搁了。因此，我建议用Stata的同学搜搜Statalist网站上的技巧，会大幅提升计量经济学量化分析的效率，更快更好地做出计量分析结果，从而能提高论文写作效率，做到事半功倍。另外，我也推荐师生们阅读《数学分析上下册》，居家期间“充充电”。最后，我想用尼采的一句话送给大家共勉：不能击败我的，会让我更强大！

学生点评

本学期我学习了严子中老师授课的计算机编程这门课程，我的感受是严老师真的是非常认真地给学生们进行线上授课，真心地希望同学们学到新的知识。首先，老师的备课工作做得非常用心，每节课课件的每行代码都有备注，方便同学们回顾学习。课堂直播过程中，老师也非常耐心地给我们演示如何运行代码，教会我们如何熟练运用每个知识点，并且为我们解答各种问题。课后作业部分也非常有意思，严老师给我们分小组完成作业。这样组内3-4个成员可以进行代码互享，互相学习、补充知识。同一道题可以学到不同的解法并选出其中最优的解法。综合而言，我认为这门课程在疫情期间的线上开设是做得非常好的，严老师的授课质量非常高。

——2018级本科生漆也畅

我本学期很荣幸地担任了计算机编程的助教，为严老师的教学提供辅助。根据以前的经验，初学Python的同学在安装软件的时候就会遇到不少问题。在正式开课的前一周，严老师和我便开始协助同学们安装Anaconda，这使得之后的教学安排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最值得一提的是，与传统的在机房上课相比，线上上课的模式并未对本门课程的教学造成障碍，反而为大家提供了更多便利。严老师利用Notebook对代码进行演示，通过腾讯会议与大家共享屏幕，大家在自己的电脑上便能清晰的看到代码及其运行结果，加上严老师通俗易懂的讲解，不管是Python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同学都有新的收获。

——2016级本科生张艺瀚

IESR助理教授殷立娟：创新教学思路，打造多元新课堂

授课课程：中级宏观经济学

至今，线上授课已经有一个月了。回忆起一开始使用直播软件授课的情形，我和同学们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比如开视频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脸出现在平台上的小尴尬，以及学生在“开麦”听课的过程中突然冒出一些别的声音等。不过，后期大家都熟悉了软件操作，情况就好很多了！在这这段时间里，我也摸索到腾讯会议这个平台更适合我这门课程的教学，因为我比较注重让学生从新闻报道里去感知经济运行，去运用理论模型解释经济现象，腾讯会议支持在课堂中插入一些当天的新闻报道等视频内容。

这一个月的线上授课给我的感受是在疫情横行的这段期间，“上网课”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都相对安全，也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但它也有不太方便的地方，就是我们难以得到学生的学习反馈。为确保教学质量以及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我的做法是：

第一，在课前准备的时候，尽量设计更多的提问问题，同时把问题设置得相对简单一些，以点名提问的方式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然后通过他们的回答得到更多的反馈。第二，面对面教学可以通过黑板板书，但是线上教学的话在电脑里面板书就没那么方便。因此，我事先用pdf的adobe编辑的方式把课件打开，并在有重点需要记笔记的地方以及总结的地方进行编辑记号。还有就是画图，由于笔记本电脑不太便于画图，因此课程中需要画图且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模型时我都会事先在pdf准备好，并上尽可能做成动态图。第三，在课堂上，除了多提问，我还设计了一些比如让大家一起看新闻报道等视频，让他们更多感知现在发生了什么。另外，我会让他们做课堂展示，布置一个小组作业让大家一起合作，最后学生们提交一篇论文。第四，在课后，一般情况下我都会留在直播间里解答同学们的疑问，另外我也会一直关注我的微信和邮箱，及时解决同学们发来的问题。

居家期间，其实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学习空间，只要你想学，其实是没有限制的，工作也一样。同学们可以更多地关注财经新闻，关注每天的经济政策、经济形势以及发生的各种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对于英文不太熟练的同学，推荐利用好慕课课堂这个平台进行自我提升。

对于毕业班的同学，在论文写作方面，建议多看看那些发表在顶尖期刊上的写得好的论文。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关键是大家要坚持住！最后就是希望同学们在家期间更多地陪陪自己的父母吧！

学生点评

第一次上网课，作为学生刚开始对上课效果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老师，师生互动显得很难，另一个就是上课注意力肯定没有平时这么集中，再加上某些不可抗力，直播软件偶尔会崩画面会很卡，音画不同步等等。

但是方法总比困难多，殷老师的课就是这样，为了提高课堂趣味性，集中学生注意力，老师会播放一些财经新闻，尤其是上次由于网速原因整个过程特别卡顿，殷老师就让我们先学习mooc的内容，自己在旁边解答疑惑，等到下节课还带着我们把上次的内容快速回顾一遍，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

——2018级本科生凌心婷

因为疫情原因，本学期殷立娟老师的中级宏观经济学采用线上教学。每次课课前，殷老师都会带我们阅读一篇近期时事新闻或观看相关视频，并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解析事件背后的类因果果，意图从实际出发，培养我们的经济学直觉。这种书本之外的教学拓展，极大地丰富了课程的内容，更让我觉得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学经济学的学生不仅要平视仰视，有时也要俯视这个世界，带着冷静细致的思考和丰富的同理心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

——2018级本科生杨静茹

学生对课程的高度评价是IESR授课教师们认真上好每一堂课的动力。在线上教学的探索之路上，他们也曾手足无措、磕磕碰碰，今日所得的感悟和经验离不开他们辛勤付出的汗水与高度负责的态度。希望各位老师们的勤勉认真也能给疫情期间在家学习的你带来激励和鼓舞！

青春之花”在战“疫”防控前线 绚丽绽放

2020年的冬末春初，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赋予了“90后”、“00后”特殊的意义。在奋战的最前线，我们看到了“破茧成蝶”的青春力量。在这场“疫情”大考中，IESR的学子们亦不惧风雨，主动请缨，勇担时代责任，向社会展现了青春一代的蓬勃力量。

冲锋在前 社区战“疫”防控一线的“战斗堡垒”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前线。在疫情爆发初期，社区防控工作任务繁重且具有较高的风险，我院19级罗煜文和18级管子旂两位同学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开展体温检测、排查等防控工作，用青春力量守护社区家家户户居民的安康。

19级罗煜文 [体温测量志愿者]

在疫情“肆虐”中国时，能够以一名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为社区出一份力，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同时也深感责任之大。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对每一名进入社区的人员展开体温检测排查。在这期间，大部分居民都很配合，但仍有部分居民心存侥幸，不佩戴口罩之余，也不配合设卡工作人员的工作，由此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基层抗疫人员工作的不易。最后，希望大家可以积极配合执行一些必不可少的防疫举措，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疫”，疫情才能早一些结束。

18级管子旂 [体温测量志愿者]

在疫情发生之初，我和父母便响应社区志愿服务的号召，报名参与社区防疫防控工作。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在小区门口测体温、帮助居民绑定“邻礼通”app和发放通行证。期间，居民们都很配合我们的工作，社区内也实现了患者人数零增长。在感谢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居民，感谢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感谢对疫情迅速做出反应的政府！正是这种自上而下默契的配合让每个地方乃至全国的疫情得以缓解。加油！

“您好，请出示一下出入证件”“您好，请配合测一下体温”“您好，请扫码登记一下信息”是他们重复一遍又一遍的话语，红马甲、防护口罩是他们的“铠甲”。尽管再累再艰难，也仍然夜以继日地坚守岗位，保障社区平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战士！

心系社会 捐赠物资支援战“疫”

在这场战争中，开展防控工作的一线人员坚守岗位，作为“大家长”守护千万个家庭，而作为被守护的普通百姓，同样也在以他们方式去守护前线工作人员的健康。在疫情期间，我院18级周婵同学慷慨解囊，为前线工作者捐去大量口罩支援战“疫”。



18级周婵 [捐赠口罩]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我们都深刻地体会到为我们冲锋在前线开展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的不容易，刚好家里仓库有大约两千多只医用口罩的库存，便和家人商量着将口罩送至当地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为物资支援，同时也是希望能为这场战“疫”尽一点绵薄之力，给他们带去一些帮助。最后，感谢每一位城管队员们在疫情期间为我们的城市付出的辛勤工作！

在这场特殊的“战火”的淬炼下，青年一代用行动和事实证明：昨日少年，今日可堪当大任！今天，疫情防控斗争仍未结束，青春之花将在防疫防控战场上越开越绚丽！

图说

【女神节特辑】IESR女教职工在抗疫期间的小美好

